

设计与时代·设计理论前沿译丛
李砚祖 主编 张黎 执行主编

日常的政治

韧性社会的生活项目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
Ezio Manzini

[意] 埃佐·曼奇尼 著
钟 芳 译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设计与时代·设计理论前沿译丛
李砚祖 主编 张黎 执行主编

日常的政治

韧性社会的生活项目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
Ezio Manzini

[意] 埃佐·曼奇尼 著
钟芳 译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主编 李砚祖

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设计艺术学、工艺美术学的理论与教学，并长期从事中国画、陶瓷艺术创作。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2003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执行主编 张黎

英文版丛书顾问委员会唯一中国学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艺术学理论专业博士。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的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思辨与批判性设计、设计史与设计理论。

著者 埃佐·曼奇尼 (Ezio Manzini)

国际社会创新与可持续网络 (DESI) 创始人。巴塞罗那 ELISAVA 高等工程设计学校社会创新设计杰出教授，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荣誉教授，上海同济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客座教授。

译者 钟芳

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副主任，专注于社会创新设计、可持续设计。国务院发展与研究中心绿色发展部专家组成员，中国社工联合会“美好社区”计划专家组成员。

丛书序

这套丛书专注于日常生活与人造世界以及其他相关的“扩展领域”，然而要实现对于上述领域的深刻理解与本质洞察，关键在于全景式呈现设计与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技术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人类学研究、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互动网络。该丛书的核心立场是将设计阐述为一种跨越并连接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思维方式，因此丛书旨在改变设计以往与思想、理解力、智识等次要的、无关的与弥散的关系或状态。其次，本丛书将为设计理论正名，设计理论能为其他传统的学理式研究提供一种以行动为本、以实践为中心的别样的（alternative）方法论选择。设计学真正的价值蕴含在马克思的智慧当中，即不仅是为了解释这个世界，更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以创建更美好世界为己任的伦理性诉求深植于每一个设计师的脑袋里（暂不论对“更美好世界”的理解可能有偏差），结合其动手实践的行为，设计将为人们理解社会行动与历史发展的发生机制提供新的可能。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设计与其他人类行为几乎无法区分，赫伯特·西蒙曾从改变、行动方案、以未来为导向

等三个面向给出了最广为人知的设计定义，此后设计常与“工具”“制造”“技术”“计算”“算法”“编程/程序”“人工物”“筑造”“建筑”“工艺”“品牌”“项目”“管理”“创新”“创意”等相近概念被混用或叠加使用，再加上各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各种新兴技术如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颠覆性重组，设计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呈现出与几乎所有时代议题的相关性。上述语境，一方面虽为人们认识设计及其时代干涉力和影响力提供了正当性和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定位设计的本质属性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重要挑战。我们既需要以时代之网尽量拓展设计的维度，也需要以学科之锚尽力往深处去扎稳设计的根部。

丛书旨在以较短篇幅、以具有时代意识的问题视角，批判性探讨当代设计的影响力与行动潜能。既有新作首发，也有旧作新编，作为对多个存在性的新兴危机做出的回应，一方面突出设计与危机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尝试提供应对危机的设计思路。这些危机主要包括：社会的伦理与政治危机，经济实践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危机，全球化、去本土化、流散与移民、性别身份等文化危机，以及技术主导的未来危机等。通过探索思想的模式以及行动的路线，将设计立足于行动的智识基础与资源框架，试

图为人们迎接各类挑战提供设计视角的路线图。

时代，可大可小，可远可近，本丛书立意从微择邻，试图以思考的力量回应时代追问，与社会互动，改变人们关于“理论无用”的误解。重估一切价值，是所有时代转向之际面临的首要工作。时代，看似宏大，实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这个科技颠覆伴随着轴心叙事缺位、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确定性的时代，重估设计的价值，成为设计理论最紧迫的研究命题。

设计理论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如何建立有趣的设计理论？设计与理论的关系如何嵌入时代性，如何引发与利益相关者的共鸣、对话，甚至辩论，从而以行动导向更善的未来？本丛书旨在对上述问题做出探索与思考。

李砚祖 张黎

2020年4月

序：在后新冠时代

我在家里写这篇序言时，由于意大利颁布封锁政策以应对新冠病毒，在家里已经闭关了四个星期。

要谈论一本涉及日常生活的政治的书，没有办法回避这个起点：这种全民闭关的情况，直到几个月前，都还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我和世界上至少30亿人一起，闭门不出。如果说日常的政治是涉及生活方式的政治，那么在2020年的头几个月中，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爆炸性的涌现：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被遮蔽于阴影之中，而此刻却变得分外清晰。我们所有人都目睹了前所未有的一幕：街道空了，工厂和办公室都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彼此保持距离，他们在网上表达了自己的社交能力。这种状况前所未有，个人和超本地性，集体性和全球性结合在一起。因此，日常生活的政治呈现在眼前，每个人都以他/她自己的方式生活，并根据他/她所处的环境而定，但也具有很强的共同特征：所有人都面临相同的约束，都有着对今天的恐惧和对明天的担忧。

当我写《日常的政治》一书时，我并没有预见到这种

可能性，尽管这本书谈到了日常选择与那些早已可见的环境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当然，流行病的风险早已为人所知，并已被列在未来可能的灾难中，但这只是可能出现的许多全球性问题之一。然后我们目睹了一切：大流行病席卷了世界，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到政府的选择，各个层面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大自然带着微小的病毒进入了这个领域，改变了所有游戏规则和所有的人类政策。从个人到中央政府，所有这些人人都必须应对自然的政治。

我们都已经看到并知道了结果。第一步，大自然已经使数十亿人闭门在家，停止生产和运输。自然向所有人展示了我们自大的脆弱性。我们需要重新讨论那些已经占据主流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与现代性这一问题一起。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本书并没有探讨疫情本身，但是，它谈到了不同的日常生活政治。如果继续下去，将迫使我们走向灾难。但最重要的是，书中谈论了那些方向相反的模式。那些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创造新世界的人们，这些人以新的协作能力和创造新的地方社区的能力为基础，即人与人之间以及与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系的人的网络。

我认为，关于这些地方社区如何以及何时出现以及能

否出现的讨论，也是本书对“危机后”讨论的具体贡献，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采取的方向。因此，这些简短的介绍性注释旨在引导读者朝这个方向思考。换句话说，它们为在本书所讨论的内容与新冠全球危机给人类的教训之间架起桥梁。

所有人都在家；一切均在线，接下来是什么？必要的强制令，意味着“所有人都在家”。在一个已经被数字技术广泛渗透的世界中，强制令也就意味着“一切均在线！”而且，实际上，许多迹象告诉我们，这正是眼下发生的事情：无论贫富，老人儿童，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品位（以及他/她的网络带宽）封闭在家网上巡游。这是什么？这将意味着什么？

人类是社交动物。在每种情况下，他们都试图与他人建立某种形式的关系。在必须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进行社交的需求，在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已经足够普及的环境中，已经产生了一种实质性的社交现象：许多人被迫在线上进行一切工作，但凡可能，一切在线。更准确地说，他们被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进行线上活动。当然，不仅从花费的时间这一角度，还包括各种类型的活动：学习和工作，解决各种日常问题。结果是，社会和文化变革在此基础上发生，很可能在危机之后以某种方式持续

下去。

换句话说，在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领域中，许多人被迫跨过使用数字技术的实际和心理障碍的门槛。结果，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实际和/或心理困难，许多人发现这些在线活动可以轻松、高效，有时甚至很有趣。不仅如此，他们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活动在线进行，还可以获得巨大的环境效益。最后，减少“必要的流动性”可以释放以前旅行所占用的宝贵时间。因此，有理由相信，当这种特定的危机完全结束时，线上活动会被视为便捷的解决方案，在线服务以及由此产生的在线社交也将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当大：在线服务的普及，以其实际的或可感知的便利性为指导，不能与其当下的主要社会影响分割开来。也就是说，它们完全符合两种非常危险的趋势：个体化和虚拟化。

趋势和反趋势。个体化和虚拟化的趋势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尽管可以说，危机之后一切都不复从前，但新冠疫情却加剧了这一趋势。结果是，如果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发生，以在线服务的便利性的名义（即以无须费力，没有摩擦的日常生活的名义呈现——一种生活的梦想），社会将继续朝着无数个人自我消解的方向前进，广泛联系，却如此孤独。一个由更多孤立的人组成的社会（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较少，也就是说，更加个体化），并且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更加脱节（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较少，即更加虚拟化）。最终，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减弱，自组织能力下降。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那么所有这一切（正如刚刚所说的）就会是未来。所以问题是：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吗？是否有任何迹象使我们认为事情也可能朝着与现在描述的（反乌托邦式）不同方向发展？幸运的是，与往常一样，现实是矛盾的。多种不同的趋势可以共存，甚至有些与之前所说的相反。要看到这些趋势，我们需要合适的眼镜。也就是说，即使它们发出的信号很微弱，也必须采用能让我们识别它们的评估标准。

例如，在“所有人在家”法令颁布之后的第一天，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阳台上煜煜发光的一群快闪人：由于渴望减少孤独感，儿童、老人，专业音乐家和整个家庭，如先前在网上约定的那样，出现在各自的阳台上，一起唱歌和玩耍。当然，由于这些特殊事件的性质，这些行动并未产生持久的社会形式。尽管如此，它们不只是人性的动人表达，它们还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居住于物理数字的混合空间中，那就是使用网络在现实世界中一起做某事。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种行动闪现于全球各地。

混合的地方社区。有些人组织起来帮助老人或被隔离的人，有在当地进行协调的公共机构和志愿者协会，有商店为无法行动的人送货到家，有一些书店支持本地的文化活动……它们都是无接触社交的例子，但是，它们都通过网络和地理接近解决了问题。培育关系网络的社交活动，在危机之后可以发展并成为混合的地方社区。也就是说，有能力同时居住在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中的社区。正是由于它们的混合性和地方性，这些社区才能赋予它们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社会体系以凝聚力和韧性。实际上，正是因为它们每天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照顾，致力于照料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所以当此类事件发生时，它们具有行动和自组织的能力和知识。因此，它们是最了解如何应对灾难性事件的群体。

话虽如此，但可以指出一个主要的设计方向：在线社交必须导向一种能够进化并进入现实世界的数字关系系统。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在（主要是）“邻居”之间的数字空间中培养关系。也就是说，在定义明确且本地化的对话者群体之间培养关系。

换句话说，提出这一策略意味着要押注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驱使我们上线的相同能量可能会推动我们建立本地化网络：在线互动在危机后时期，也能够物理世界

发扬光大。在此过程中，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混合社区。

照料地球。建立新的地方社区需要一个愿景和一些特定技能，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倾听（其他人和环境的）反馈，调整行动方向。它还需要想象、发展社会和机制实验。同样重要的是，它需要对我们，即人类，与我们迄今为止所谓的“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实际上，新冠病毒危机加重了环境危机，已经改变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框架。人们认识到，自然不是惰性的和被动的，而是会对我们的鲁莽行为做出反应的实体。结果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人类将自己视为自然的主人的造物主视角是被误导的。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谈论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中病毒是敌人。这就像在说大自然是敌人。这个想法也必须克服。我们人类应该理解的是，我们也是“自然”，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理解，我们是我们所谓的地球的更大的生物体的一部分，而像新冠这样的紧急事件，又或是我们面临的气候和生态危机，不能被称为战争，而应称为灾难。实际上，应用于自然事件的战争隐喻表明了自杀策略：对自然的敌对行为，因此也是对我们自身的敌对行为，相反，如果自然是一个大型的活生物体，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如果这种有机体生病了，我们必须采取和实施的应该是治愈策略，治愈自然

也可以拯救自己。

但是，为了使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并带来积极的结果（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哲学上的重新定位必须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实际实验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必须与能够照顾自己并能够照料地球的地方社区的可见的、有形的建设行动相互作用。反之亦然。

埃佐·曼奇尼

布奇内^[1]

2020年4月4日

[1] 布奇内：Bucine，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一个小镇，作者居住地。

前言：你在这里/对世界的观点和行动

很多年前，我被一张恒星闪耀、星系氤氲的图片所震撼，其中的箭头指示一个白点，上面写着“你在这里”。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我相信我对它的理解要好一些：人类以其巨大的复杂性处于一个巨大的宇宙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站立在这个点，从我们身处的浩瀚宇宙的渺小地方，我们行动、思考，并且改变周围的事物：我们生活。

因此，从我们和我们的所在出发，并不意味着无法还原的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表达。相反，这是对极限的承认：谦卑地认识到，无论我们如何思考和做事，我们都只能从自己所在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

对我来说，对世界的这种观点和行动是“超”局部的。在这种情况下，前缀“hyper”有两个含义：它显然是非常局部的，但在今天，相较过往，更是一个无边界的局部，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并采取行动，但始终且仅在我们的立场之上。

在本书中，我假设这种观点是为了从日常存在出发，

讨论我们生活项目的性质和政治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我们思考的相对性，试图在复杂性中探索，并接受相对性所施加的限制。

这本书是根据我作为社会创新领域的设计师的经验而诞生的，旨在为至关重要的、协作的设计能力的传播做出贡献。它不是一本社会学书籍或一本政治学书籍，它也不是日常生活设计手册。它是一本或至少有希望成为一本设计文化的书，其潜在读者包括参与设计活动的每个人；因此，实际上意味着每个人。

我选择了一个我认为是好奇和聪明的但不一定是专家的人作为我的对话者。这影响了我编写书目、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方式：我将参考文献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用注释来提示那些对我的写作产生特别影响的人和事。

目 录

丛书序

序：在后新冠时代

前言：你在这里/对世界的观点和行动

001 1. 轻社区：流动世界中的社会形式

005 流动

020 开放

033 轻盈

041 2. 生活项目：自主与协作

043 项目制作

056 探索

067 协作

- 081 3. 日常生活的政治：设计行动主义和转型常态
- 083 行动
- 094 越界
- 102 转变
-
- 115 4. 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思想和项目生态系统
- 117 普及化
- 124 实验
- 133 参与
- 140 使事情发生
-
- 153 后记：另一本书/设计专家和分散的设计能力

1. 轻社区：流动世界中的社会形式

在我住的村庄附近，有一棵古老的荷姆橡树（*quercus ilex*），它矗立在葡萄园和林地间的诱人空地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日落时分，一群人站在它周围巨大的拱形树冠下，树枝几乎垂到地上，形成了一个宏伟的绿叶室。在这个绿叶房间中心，靠近它的树干，一群演员背诵着《奥德赛》的段落，一旁有三个音乐家演奏当代音乐。稍后，还会有葡萄酒和食物。太阳落山了，人们分享着这幸福的时光。但是……

我们都知道，在其他地方，在彼时彼刻，有人正在逃难，有人被狙击手击中，有人死于饥饿。这些人，没有树木可以聚集。其他人，很多其他人，并没有处于如此戏剧性的境地，但同样，他们不可能有如这般的生活：因为他们周围没有这样的树，或者即便有，人们却无法认出。那么为什么这一切（仍然）存在呢？

我想谈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如何变成这样的时刻，每个人都幸福，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周围的每个人也幸福，人们为自己感到幸福，为世界感到幸福。在我看来，共享幸福不意味着对不幸的人们无动于衷或一无所

知。它并没有消除对世界上四处蔓延的冷漠、利己主义和暴力的恐惧。相反，它是简单的、精致的，它不同于当下盛行的观点：幸福是竞争成功的结果以及可能从中获得的利益。一群人围着一棵树，听着诵读和音乐，一起晚餐，这是另一种情境，它可能存在，也可能指向行动的方向。

我在夸大其词吗？我是否对围着树木的这群人强加了太多责任？也许吧，但我相信我们应该能够在那里认识到新文明的种子和可能的未来景象，在彼时彼刻，我们可以看到新兴的文明。

那么，再以此场景为例，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在那里？他们是如何来到那里的？

荷姆橡树周围的人代表了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有些人世代相传，其他人后来定居。其他人则代表新的游牧民族——游客或移民。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系网络，其中包括和在场的其他人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些人有本地的，有外地的，他们分散在物理世界，也遍布于数字世界中。在此时此刻，这些不同的网络相互交织在一起，将人、地、事编织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呈现并构成了一个社区，与过去的社区不同的是，这种现代的新的社区形式尚未成形。这是一个由于选择而形成的社区，它是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设计和建造的。

当我在本书中谈论社区时，我指的是这种类型的社区，自愿的、轻松的、开放的社区，其中每个成员的个性与共同做某事的愿望之间保持平衡；它是流动的社区，如果没有这些社区，那么就只剩下互相联系却身处孤独的个人，或者是神经反射式的尝试，即回到过去封闭的基于身份认同的社区，但即便传统社区曾经如此具有吸引力，也肯定是无法回归的过去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在那里而没有关在家里呢？他们已经给出了迅即的答案，他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共享幸福时刻的价值，并将其视为共享的善。在试图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时，我们发现了各种线索，对戏剧和音乐表演的兴趣，对美食和美酒的兴趣；与老朋友见面或结识新朋友的乐趣；仅仅出于这个地方的美丽；乃至因为一棵古树的魔力。这些原因在实质和性质上是不同的。它们是可以生产、购买或给予的东西的混合物，没有人可以单独生产这些东西，这是随着时间流逝而共同创造出来的混合物。从《奥德赛》中重新找到的共同根源，几乎每个在这里的人都曾经学习过或至少听到过；彼时彼刻产生的信任感和同情心。共同的幸福基于对这些公共物品的认识。

这一切怎么可能？显然，我所描述的一切都不是自

然现象，它的存在是因为有人做到了。一直都是这样。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回到过去，我们会发现许多类似的情况，各种不同的群体围绕着一棵树或一堆火，有人弹奏乐器或在背诵八行诗，当然会有食物和酒。但是，过去的情形与我开始谈到的围绕荷姆橡树的人们却无法类比。在过去，那些群体中的人们并没有真正自主选择在那里。在过去的社区中，事情之所以是那样的，仅仅因为它们一直都是这样。在那里，食物、音乐、剧院都在那儿，因为它们一直在那里（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而人们在那里，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情”。这种传统体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思维和做事方式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几乎不再存在。它当然不属于我所描述的场景，每个人都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人让其他人来。但最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其中的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放弃最初的印象之前，我想指出我们在那里看到的社区是多么的脆弱，由这种社区带来的共享幸福感亦脆弱至此。只要土地所有者决定其他人不能待在他的土地上，一切就将分崩离析。不得不削减预算的地方政府，今天出于远见卓识而支持社区，明天就有可能撤回资助。出于短视的经济方面的考虑，组织者可能会决定仅推广与游客有关的活动，但削减对创造地方所必需的连续性的团

体——当地居民的活动的支持。哪怕行为粗野的人数量增加，而人们没有办法将这些人稀释开来，都将带来致命的后果。

这些会带来逆向结果的事情林林总总，我只是希望能够提醒各位，当我们经历着美好的群体氛围时，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氛围既脆弱又珍贵。它需要精心培育，需要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的关心。但是谁在构成我所说的“每个人”呢？为什么我称它们为社区，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临时聚集呢？

流动

如果世界变得流动。世界似乎正在失去坚固性^[1]：组织正在消融，组织中的生命形式正在变得不稳定；每个项

[1] 大约 30 年前，我第一次发表这一声明，我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发现了复杂性”。在这方面，埃德加·莫林对我很重要，但米歇尔·塞雷斯的思想也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我稍后再回到这些作者，现在我只想说明，他们教会我不仅要视流体世界为一种风险，而且还可以将其视为新的机遇，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我认为仍然有效，尽管此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实际上，它不仅构成了第 1 章的背景，还构成了整本书的背景。Edgar Morin, *La Méthode 1. La Nature de la Nature*, (Paris: Seuil, 1977); Michel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èce: fleuves et turbulences*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7).

目都趋于灵活，每个选择都是可逆的。或至少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这个（几乎）流动世界的特征是从过去（几乎）坚实的世界中发展出来的。过去几个世纪的农业和工业社会都是有高度黏性的体系，因此在实践中它们是（或者被认为是）牢固的，社会和生产组织牢固，社区和个人纽带牢固，福祉观念牢固（这又主要基于事物的坚固性，土地、房屋、拥有和消耗的商品）。这种坚固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难以穿透空间（这使人们不愿移动事物和人）和信息传播的局限性（限制了思想的传播和组织的空间分布）造成的。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创造了第二个稳定因素，社会惯例和文化传统的持久性，以及因此对组织变革的抵制。

最近，整个全景发生了变化，热量融化了固体材料，连通性已经消解了组织。社会习俗和过去的社区一样，已经失去了控制力。牢固而持久的联系正在消失，轻巧而又多变的社交网络正在出现。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令许多人（包括我）感到担忧，这个由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所殖民的动荡世界，正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孤独世界，由不稳定的工作和极端不平等构成的世界。它缺乏对未来的愿景。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精确

地指出，这是流动的、现代性的世界。^[2]

就我而言，我和鲍曼，以及其他和他一样描述当今动荡世界的悲剧的人们有着相同的担心。但是，我想将当代现实的流动性与它所产生的问题区分开来，并假设流动的世界可能比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更好。

也许它很有可能比过去的坚实世界更好。毕竟，正是过去的坚实世界，或更确切地说，就是使我们将其视为坚实的文化，才使我们陷入了当下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灾难。也许，流动的世界这一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以更轻便、更适应周围所有事物的流动性的方式在当下生活。

在西方文化史上承认事物的流动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如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3]几年前写的，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有两种平行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一种将世界视为由稳定的事物构成的实体世界；另一种将其

[2]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是波兰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的“流动的、现代性”论述最能概括当代社会的典型本质。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2000); Zygmunt Bauman,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2004).

[3] 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是法国作家和哲学家。在这里，我特别指的是他的书：Michel Serres, *La naissance de la physique dans le texte de Lucretèce*.

视为流动的世界，由运动的粒子制成。因此，对塞雷斯而言，这种解释模型意味着回归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或是金星对应火星。但是，科学也将我们带到了同一方向。今天，我们知道，自然、人类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实体；探讨生命系统的流动形式，而非矿物质的静态构成，可以更好地描述其复杂性。因此，审视世界并承认其流动性可能是放弃过去的机械（因而无效）解释模型的第一步，最后与世界的复杂性达成和解。这也意味着不仅会在应对日常生活的实际复杂性时遇到问题，还会碰到新的和以前难以想象的各种可能^[4]。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使用流动世界模型来描述当今事物的发展情况，无论是通常情况，还是仅仅用于理解社会形式，这两种情况中，流动世界模型既可以描述出现的问题，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让我们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形态是如何生成并且存活的？

在坚实的世界中，答案似乎很明显，这些形式是通

[4] 有许多路径可以发现复杂性。就我而言，我是30年前通过埃德加·莫林的思想到达的。莫林是法国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是最早提出从科学领域到哲学领域中的机械模型危机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的人之一。Edgar Morin, *La Méthode 1. La Nature de la Nature*.

通过对材料（以物理或隐喻的方式）作用而创建的。在这之后，由于其坚实的本性，这些形式会一直持续下去，它们自然而然地维持这种自然状态，除非有什么事情发生。换句话说，事物可以被创造，一旦成形之后，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它们注定要持久。这种说法虽然不太准确，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观察事物的主要方式。在缓慢变化的世界中，它使人们能够足够精确地对其进行解释。

那流动的世界又有何不同呢？经验告诉我们，在流动世界中也会产生形式，例如旋涡或流体的层状结构。当许多粒子被其周围环境推动着有序移动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时，形态会自行产生并保持原状，只要产生该形态的周围条件不变即可。

用这种方式，我们将行动的结果看成是流体形态的交织，通过对它们的环境采取行动，使得形态的存在成为可能，只要存在这些条件，形态就可以持续下去。换句话说，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要使社会形式出现，就需要创造有利的条件，然后加以精心维护。

当我们采用这种解释模型以理解人类行为时，可以发现“创造有利条件”和“精心维护”是两项基础工作。在坚实的世界中，人们被引导去想象自己或他人，能够像有权有势的人一样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如造物主般直接影

响世界并永久改变世界。相反，在流动的世界中，集体行动是建立有利环境的唯一可能性。它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关注和聆听事物的重要性，对其精心照料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它告诉我们关怀的重要性。

变革性的社会创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流动世界的特征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传播和危机为特征^[5]的。探讨流动性的本质和悲剧性的后果并非本书的意图。只是，它们的普遍性使得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反思殖民式的技术创新将巨大的力量和财富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中，就不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它们造成失业、就业不足、边缘化，以及作为回应，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反民主的内卷化。此外，通过试图使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入竞争和经济效率的领域，它

[5]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产生了数不尽数的著作。我将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和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为例，这三位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我影响巨大。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尽管他们的观点主张多元，但是给批评提供了连贯性和深度。这体现在他们的许多书中，参见 Joseph Stiglitz *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Noam Chomsky *Who Rules the World*,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6;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正在加剧社会的分解进程、加剧公共和亲缘关系的荒漠化以及公共利益的商业化。

然而，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普遍存在，它们并没有占据整个舞台。对当代现实的仔细观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复合而动态的社会格局，其中存在其他思维和行动方式。它们是富有创造力、进取心的人们的主动行动的结果，这些人在遇到问题或机会时会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将其付诸实践。这些解决方案同时为个人和社会赋予了价值观，从互助小组到关爱社区，或者从小规模生产到城市共同体的再生。此类行动往往使人们（重新）互相联系起来，与人们居住的地方（重新）联系起来，并重新建立相互信任和对话的能力，从而创造了新的社区。

这些活动最初是由一小群爱好者创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动不断发展、演变并得到了体制的认可，最终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主流不同的趋势出现了，协作式社会服务、各种形式的分布式开放生产、协作式福利、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新关系的食物网络，最终越来越多的人提议，城市应被视为公共财富。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参与的人们已经打破了构成主流文化核心要素的个人主义，通过合作以共同实现对每个人，确切地说，对每个参与者都有价值的结果，这种结果

对社会整体同样价值重大。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从小组活动开始的，但最终有可能大规模地影响体制和政策，这些构成了社会创新的概念，最近几年，这个术语在整个社会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具有多种含义^[6]。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在社会技术系统中的变化，变化的性质和结果也具有社会价值，具有解决社会问题和（再）产生物质和社会公共财富的双重含义。

为了获得这些结果，必须进行彻底的系统改变。这需要重新定义意义系统，在这个意义系统中，才能定义问题，进而找到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表征他们的权力关系。

最后，对我而言，正是这一点使这种社会创新变得如此有趣，它是基于协作的，它可以再生公共财富，因此社

[6] 本世纪初出现的社会创新现象的概念化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杨氏基金会（Young Foundation）和 Nesta 的英国研究人员的推动。因此，我认为这个定义是正确和有用的，“我们将社会创新定义为能够同时满足社会需求（比其他方式更有效）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产品、服务和模型）或协作。换句话说，它们是既有益于社会又能增强社会行动能力的创新”。见 In Robin Murray, Julie Caulier Grice e Geoff Mulgan, *Open Book of Social Innovation* (London: Nesta & the Young Foundation, 2010).

会创新对于当下的主导思想和实践至关重要，它以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为目标，提出可以行动的坚实步骤。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种社会创新，即变革性社会创新^[7]，是整个社会创新的子集。确实，有些创新与我所指出的创新方向不同，那些是创新性不强，或仅限于提出渐进改良的创新，或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完全相反的创新。因此，必须理解，当我在本书中写“社会创新”时，该表达应理解为以下缩写：通过采取实际行动，以可持续为目标的变革。

过渡中的局部不连续性。经过近半个世纪对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的研究和实验，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知道，这需要对文化和社会技术体系进行彻底的改变。这种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与封建社会向通常所说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变没有什么不同。鉴于如今的全球互联互通，今天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不会花那么长时间，而且从开始它就将涉及整个

[7] 欧洲研究项目 Transit 于 2017 年结束，它引入了“变革性社会创新”一词。其任务是调查“变革性社交网络计划和网络，以期了解社会变革的过程”，见 Transit, *Doing Things Differently*, Transit Brief #1, 2017, <http://www.transitsocialinnovation.eu>.

星球^[8]。

今天，我们还知道，当积累了小规模的根本性变化时，就会发生大规模的系统性变化。但是，渐进改良不能为系统变更做准备，因此它们不是迈向可持续性的步骤。例如购买碳排放较小的汽车，肯定会有助于局部改善空气质量，这是积极的，但不会影响运输系统，以单个汽车流动性为基础的运输系统是其固有的不可持续性的根源。另一方面，离开私家车，骑自行车、步行或组织拼车活动会改变本地系统，因此有助于为重大的系统性变化创造条件。对于那些不再从大规模零售贸易中购买水果和蔬菜，加入有道德的购买小组或与当地生产者建立其他直接关系的人们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变革性社会创新的案例，它们在局部规模上产生不连续性，即带来系统性变化。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并且值得再三强调，正如我们所说，向可持续发展过渡需要巨大而高度复

[8]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无穷的文献。对于基本问题，有必要阅读斯德哥尔摩适应力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关于人类世及其极限问题的著作。<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7-02-16-wef-2017-beyond-the-anthropocene.html>. Thomas Hylland Eriksen, *Overheating: An Anthropology of Accelerated Change* (Pluto Press, 2016).

杂的变化。因此，它不能从控制塔驱动，它必须从内部开始，从局部子集内部的变化开始——在地的，而且也应该是各种微观在地层面的日常选择。只要人们愿意，这些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的选择，改变饮食，停止吃肉，您只需要决定，就不需要问任何人；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去（前提是您会骑自行车）。要开启某种形式的协作住房，您只需要与一群邻居达成协议。我并不是说这很容易。这些选择中的每一个都需要重新定义事物的含义以及我们赋予它们的优先级。我只是想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系统的变化不会推迟到未来。现在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有时是个人选择，更多时候是通过集体决策。社会创新给我们的最重要信息是，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迈向可持续性直接的、可行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澄清形容词“在地”的含义。到目前为止，它不一定涉及我提到的那种小规模事件。这意味着正在发生变化的系统是更广泛的大系统的一部分（局部尺寸），由此，就像一个人从开汽车换成骑自行车会产生局部不连续性一样（假定骑自行车在该地区还不是一个固定的习惯），当一个城市决定与该地区的主流思想和行为背道而行，引入了自行车道和其他替代性交通方式，从而改变当地的交通模式时，也会带来局部不

连续性。此外，由前面的示例可以推测，一个地方的不连续性并不一定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发生，在每个人都骑自行车的阿姆斯特丹，显然不会产生不连续性。在另一个长期废弃自行车的城市骑自行车则完全不同。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必须始终根据系统所在的社会背景逐例评估系统的不连续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这里使用社会创新的方式和地点可能与通常提到的方式和地点不同，在边缘地区，而不是在中心地区（在外围，而非中心），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在更广泛的社会及其网络中，而不是在实验室和大型决策中心中）。出于这个原因，之前提到的新兴的社会创新案例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但往往不容易被人们所认识。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意识到时，有时会强烈地反对（因为系统性的改变，会改变经济结构和力量平衡）。在其他情况下，当一个想法显示出巨大的传播潜力时，它们就被吸纳进主导经济模型中（随之而来的是其初始社会价值的丧失，正如所谓的共享经济中的许多案例）。我们将在第4章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社会公地及其再生。在前面我多次提到公共资源，而没有讨论在此背景下应如何理解该术语，但是它们是我们

讨论的核心部分，因此我们需要暂时停顿一下并给它们一个有效的定义。

该术语指的是对我们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各种物品，有些是物质的和自然的，例如水、空气和环境；其他是社会性的，例如道路、城镇广场、公园和花园，除此之外，还有相互信任、协作能力、分散的技能和能力、可感知的安全性以及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其他内容。传统上，它们的存在从未受到质疑，因为尽管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只有在它们开始消失时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今天，由于我们漫不经心的生产和消费，以及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思想所带来的压力，两者共同作用，公共物品正在消失。在这个以经济为主导的世界中，这些观念及其主张使我们生存的每一个物质和非物质领域都具有商品化倾向，在此背景下，公地问题遵循双重轨迹。一方面，这些公地被侵蚀和/或变质到被完全消耗掉的地步，不幸的是，这是当下的主要趋势。然而，另一方面，社会创新正在创造反趋势，尤其是在这一领域。在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中，不断涌现出各种形式的策略。换句话说，正在发展的文化和政治也意识到公地的重要性，意识到它们的消失所带来的风险，由此提出了旨在促进其再生的反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将之付诸

实践。我将在稍后讨论这个政策^[9]，即日常生活的政策。在这里，我只是想提出一个有用的定义，以帮助我们了解其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卡洛·多诺罗（Carlo Donolo）的定义是有效的，公共领域是“*un insieme di beni necessariamente condivisi. Sono beni in quanto permettono il dispiegarsi della vita sociale, la soluzione di problemi collettivi, la sussistenza dell’ uomo nei suoi rapporti con gli ecosistemi*”

[9] 公地的概念由来已久。多年来，在谈论可持续性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作者经常使用它。但是，直到最近，它才成为许多人眼中无所不包的主题，包括未来的所有可能策略。首先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的研究使她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出现了其他学者，例如Stefano Rodotà, Silke Helfrich, Michel Bauwens, David Bollier, Gregorio Arena, Christian Iaione 和 Sheila Foster, 这个概念在公开辩论中得到了介绍，并且在社会创新领域得到探讨。就我而言，关于这些主题的决定性会议是2015年在博洛尼亚举行的“作为公地的城市”大会，这是国际公地研究协会（IASC）首次举办的关于城市公地的主题会议。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chel Bauwens, *Towards the Partner State Model of Commons Governance*; Gregorio Arena, Christian Iaione, *L’età della condivisione. La collaborazione tra cittadini e amministrazione per i beni comuni* (Carrocci Editore: Roma, 2015).

di cui è parte. Sono condivisi in quanto ... essi stanno meglio e forniscono le loro migliori qualità quando siano trattati e governati come beni 'in comune', a tutti accessibili, almeno in via di principio”^[10]（翻译为：一系列必不可少的物品。它们使社会生活和集体问题解决方案能够发挥作用，并促进人类在所处的生态系统中更好地生存。它们被共享的程度是……它们可被充分共享，当它们被视为“共同的”物品，并被赋予最好的品质时，它们的效用最佳，至少在原则上，它们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

这个定义表明，要拥有公地，就必须有一个社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公地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发展”，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滋养并复兴社区。但是，与此同时，社区共同管理着公地，因此隐性或显性地定义了规则。从这里得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并非所有公共财富都是公有财产，并非所有公地都是公共的。被人们忽略和遗弃的广场是公共财产，但没有社区照顾它，因此不属于公共财富。另一方面，由邻居们自发照顾的邻里花园，即使它位于私有土地上，但仍然属于公共财富。例如，在本章开始

[10] Carlo Donolo, *I beni comuni presi sul serio*, in <http://www.labsus.org/2010/05/i-beni-comuni-presi-sul-serio/> accessed on 30 September 2017.

时，必须澄清荷姆橡树是非公共财富，但是当它成为社区的中心时，便成为公地的一部分。

同样的双向关系也出现在社会公地上，相互信任、协作能力、分布的技能、对安全的感知以及我们将在以下各章中提到的其他公共物品（与所有公共物品一样）都由社区创建并重新生成。同时，它们构成了所有可能的社会结构的经线纬线，没有它们，社会将实质性地散架。另一方面，它们也像所有公地一样不能被法令裁定，因此它们的存在和质量有赖于赋予其再生能力的各种活动、对话和项目。

过去，在坚实世界中，当社会变革缓慢时，社会共同体从社区的长期工作中“几乎自然地”出现。如今，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传统社区正在瓦解，新兴的社区无法以过去的准自然方式重建它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前所未有的新社区的本质，以及它们自身随着时间形成和发展的方式之后，我们现在必须来思考有没有其他方式，以及如何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相同的目标。

开放

人，相遇和对话。为了继续我的思考并达到可以讨论新社区的基点，我将从参与者的观点出发，我从现在开

始，将参与者作为我们故事的主角。

因此，我们的主角是一个与其他生物（无论是否为人类）一起过着流动的日常生活的人类。我在这里没有采取以人为本的方法。我要你想象的人不是被放置于宇宙中心的抽象的、强大而理性的人。我想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位于一个明确的时间或空间中，被他可以看到的東西围绕，带着他的情感、他的记忆、他的慷慨和他的自负，以及他所带有和产生的所有矛盾一起。然而，这个人对我们而言很有趣，因为带着他所有的局限性，世界正是由他和像他一样的人构成，大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无论是好是坏。

由于主要的经济力量（市场和国际金融）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整合主义和种族主义）似乎主导着人们的常识，从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们开始讨论，从日常生活的过程出发，直面他们的问题和生活计划，这已经是一种道德和政治选择了。这样的选择表达了一种信念，即，无论如何，世界不是一个响应统一逻辑的巨大机器，它始终是不同的欲望和利益以及不可预测的环境互相纠缠的结果。因此，总是存在着可能的空间，其中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想法。另外，我相信改变的可能性，正是来自我们生存的物质及日常层面上。在一个被残酷的市场和金融法则所动

摇，被种族和宗教纯洁者的荒谬叫喊所迷惑的世界中，我相信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都是构建更公平社会的起点，这个起点不会危害地球生态系统乃至我们人类整体。

当然，我们非常了解，人类会变得不宽容、自私、懒惰并且无法超越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他们有能力出于疯狂的原因互相残杀。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可以宽容、积极、善于社交、投资自己的资源，甚至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正如我之前所说，呼吁人性中的积极部分是一种道德和政治选择。这也是一种前瞻性的、主动的选择，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人性的哪个方面占上风感到乐观，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合作改变世界，那就别无选择。在我看来，这是当下的唯一前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主角。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可以被定义为生物，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存在^[11]。这意味着当他呼吸时，他会吃，会繁殖，或者在思考时，他会说话并组

[11] 这种观点应归功于 Humbert R. Maturana, Francesco J. Varela. Humbert R. Maturana, Francisco J.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NDL: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Herbert R. Maturana,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Self consciousness and the Physical Domain of Existence*.

建关系。显然，这两种描述是指同一实体，但它们也是自治的描述（即，它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件事），生物在生物学的时空中共存，并生活在物理环境中（并产生物理环境）。社会存在在社会学的符号语言领域中并存，并且生活在语言中（并产生新的语言）。

第一维是第二维的必要条件（因为思考和交谈的主体必须是在物理环境中的生物体），而第二维则使第一维存在于人类中。对于人类来说，所谓的现实，实际上只是在有观察者描述的情况下才存在。因此，它不能与观察者所使用的语言、他所参与的对话以及最终与他所创造的社会形式分开。

让我们在社会形态这个概念上稍做停留，我已经使用过它但没有给它一个定义。

社会形态是指人与人之间交织关系的网格，只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就会获得可识别的特征^[12]。因此，社会形态这个术语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它包括制度化的社会形式，例如家庭、商业公司和国家机构，以及各种非正式社区，那些非制度化的社会形式，构成了每个社会的联系结构。因此，社区也可以被描述为交织的对话网，其性质将

[12]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是德国社会学家，他的研究开创了社会结构的概念。他是社交网络分析的重要先驱。

取决于在其内部进行的对话的类型以及引发对话的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谈论世界（关于事物的状态）以及如何改变世界（关于事物的状态如何变化），因此社区也以各种方式因事务（利益共同体）联系在一起，或因行动而联系（目标社区）。此外，在坚实稳固的传统之中，还存在着一些社区，这些社区是通过选择存在的：意向社区，一个人可以自由进入而同样可以自由离开。

谈到我们主角的生活，就不能不参考他的境遇和他所参与的对话来形容他，这构成了他的社会环境。

但是，在我继续之前，需要小心一点，我无法继续思考世界上可能找到的每种社会形式，因此，我将把领域限制在我最初提到的流动、连通的世界中。我非常清楚，这种情况并不适合所有人，当然也不适用于每个人，但是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像主角一样，我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观点和行动。但是，我希望从观察出发得出的反思可以揭示差异，并激发那些正在对世界采取其他观点和行动的人们进行自主反思。

因此，我们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快速流动、相互联系的社会的一部分，正在经历着危机和变革。这个前提不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还可以被延伸至处于相似背景的所有社会，这些社会正在自我调整以适

应其当下的特定背景。

社区作为机会空间。“社区”一词通常让人们联想到封闭的社会形态，包括与某个“地方”相连，社会网络密集、稳定且持久，带来一种既怀旧，又有些类似幽闭恐惧症的复杂情感。我们可以谈论它，但事实是，这种根植于某个地方且时间稳定的封闭社区现在几乎不存在。它们仍然存在的地方，正处于危机中和/或正在变成其他事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形式的社区不存在或将不存在。恰恰相反，近年来，无论对错，我们称之为社区的社会形态的数量在增加，但传统社区的这种特定形式将一去不复返。发生了什么？这是怎么发生的？

眼前的答案很熟悉，对空间接近性的限制的突破（首先依赖交通，之后依赖通讯）改变了社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结果是，现代化社会中的个体发现自己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即主体之间互动的可能性（以及社区存在的可能性）不再受限于对话者之间的空间接近性。由于可以进行沟通，而不论距离如何，社区并不一定意味着是物理的、受限的、连续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多种社会形态的一部分，并与各种分散的对话者进行对话。

当下的日常生活已与前现代时期截然不同，我们在遥

远的地方以不同的时间表工作；我们的孩子不上同一所学校；我们与家人互不相识的人结婚；当我们死后，我们都不再去同一个墓地。结果是，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已经瓦解。封闭的团体开放了，社会似乎由生活在当下技术空间中的个体组成，成为有联系的个人^[13]，这些个人不再受社会关系所束缚，但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彼此联系。他们是个人，他们参与各种不同类型的对话，因此他们解散了先前的社区（前现代社区以及上个世纪形成的社区），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有些人是连接但孤独的，倾向于在信息泡沫中保持封闭；以条件反射式的方式，出现了怀旧的社区，回到了想象中的过去，并被局限在令人窒息的地方主义之中；两者有各种组合。因此，出现了一些新的伪社区，人们试图通过这种伪社区摆脱孤独、恐惧和身份危机，尽管很少成功。幸运的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社会创新也产生了新的社区，它们本身又产生了创新。它们明确地表明，可以有一个新的想法来使社区适应一个流动的、相互联系的环境，尽管形态多样，但创新产

[13] Barry Wellman,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pp. 11–25 in *Digital Cities II: Computation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edited by Makoto Tanabe, Peter van den Besselaar, and Toru Ishida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2).

生的社区确实具有将其与其他社会形态区分开的特征。

选择的可能性。这些新社区应被视为交织的对话网，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自由选择在何处，如何以及在多长时间内分配资源（注意力、技能和可获得的关系）。将它们与前现代社区区分开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们之间建立的联系是选择的结果，因此，我们谈论的是意向社区。但是，它们有一点与20世纪的意向社区（从政党、工会到20世纪出现的各种形式的非主流社区）截然不同，它们是多重的、非排他的、可逆的，在各种行动中都是现实的。结果，那些参加这些社区的人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和/或身份认同，而是通过其做出的选择和谈判来形成自己的解决方案和认同。随之而来的是，参与者的数量越多，在形形色色的相遇中碰撞而出的机遇的多样性就越大，对参与者而言就越重要。

机会的空间。这些新的社区可以说是机会的空间，它提供了表达和比较的可能性，各种问题在其中寻找解决方案，并向新的前景敞开。因此，它们由其中活跃的对话的数量和质量来定义。这些可能是没有实际目的的对话，或者有一些对话会导致行动。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可能是某人为某人做某事的行动，或者是每个人都在同一水平上参与，专注于结果并共同努力以达到目标的行动。最终，

在分子水平上，当代社区的特征是对话的质量和密度，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相遇（接触、碰撞），以及其成员将其转化为能够取得共同成果的行动的能力。

逐步建立社区。因为它们由交织的对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组成，所以无法将新社区设计为有机实体。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创造的是机会空间，如前所述，其中不仅会发生各种相遇和对话，而且可以鼓励它们以最佳方式发展。对于当代社区而言，似乎应该从字面上理解社区建设的内涵，社区是从其分子元素建立的，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地方之间的各种类型的相遇，构成了它们赖以形成的关系材料。因此，社区建设相当于为人们创造了聚会的机会，并提高了这些相遇的质量。

持续再生。社区建设从未能够完成。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在动荡的世界中，形式的稳定性总是与产生它们的周围条件的连续性相关。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在社区建设的初始阶段结束时，它便进入了管理阶段。但是，这不仅需要少量干预来确保社区这一术语通常暗示的功能连续性，还需要持续投入以保持社区长期存在所需的条件。这要求采取定期行动，以振兴社区，带来新的生活，并确保承诺和世代相传的连续性。

设计联盟的存在。新社区的出现和生存归功于它们内

部存在的特别积极主动、有相当互相了解程度的人。他们共同组成了设计联盟，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事实上的联盟，都试图将他们共同产生的想法付诸实践并保持下去。这样的联盟可以是水平的同龄人小组（将他们试图实现目标所必需的技能 and 权力置于小组内部），也可以是混合的（当直接参与其中的人没有实现目标所需的技能和权力时）。这个更加活跃的群体与社区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定义社区本身的特征及其长期演化而言都非常重要。

混合环境。所有这些新社区都生活在混合的在线—离线环境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区分两个大群体：旨在组织各种活动（安排会议、传播信息和协调活动）的由数字平台支持的目标社区；基于数字平台的兴趣社区，该社区使大量个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围绕特定主题（活动、事件、项目）激活群体。没有平台，他们将无法聚会、比较经验并产生共同的知识 and 愿景。

经验还告诉我们，目标共同体和兴趣共同体都是重要的，没有前者，后者将仅限于理论和原则方面的讨论，而不会影响实践。反之亦然，如果没有兴趣社区，目标社区就有可能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和经验来防止犯错，这些错误但凡有了足够的知识都足以避免。同样，背景知识可以

防止事情沿着其工具性的轨迹前进，避免最终丧失产生该想法的社会和文化价值。

地方的连续性。到目前为止，就地方观念的演变而言，有关新社区的讨论也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是赋予意义的空间。另一方面，意义是人类对话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地方是人们出于某些缘由而讨论的空间。因此，在实践中，这是一个对他们生活的地方感兴趣的社区所居住的空间。不出所料，关于地方的讨论与关于社区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对于前现代社区而言，这种互动非常简单并且可以立即识别，社区是稳定的，通过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发生的各种活动，社区成员之间产生强关系网络。因此，传统社区产生了稳定的地方，充满了意义。在流动的世界中，事情不再是那样。新社区可以在空间中产生，进而生产一个“地方”，但是，它们的空间是物理与虚拟空间的混合物，因此它们产生的地方也是混合的，并和产生它们的对话的联系一样轻巧多变。

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区和地方的危机与其消失不相关，而与它们所经历的变化有关，特别是与它们物理—虚拟混合特性的影响有关。我们可能会问，新社区的这种混合性质及其创建的地方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构成

了问题，或者许多人认为这场危机不仅是出于适应新事物的困难，还出于对（或多或少是虚构的）旧的地方与社区的怀旧之情？我的观点是，这不仅是怀旧和难以适应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面临着真正的困难，社区和地方的虚拟部分越占主导地位，困难就越大。我的这一论断有各种理由，其中一些是非常实际的（因此与我们对新事物的文化抵触非常不同）。

确实，有些活动可以在远距离和在线进行，但有许多其他活动则不能。例如，让我们从广义角度思考照料活动，照顾病人、儿童和老人，普通人在困难时刻相互支持。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的至少一部分必须具有物理维度和接近性，我们可能是众多社交网络（即在线社区）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需要某人提供实质互动时，那人却不在这里。蓦然回首，独自一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有物理维度的，在多种情况下，物理上的接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否认这一点，最终的愿景与提案将是非人性的。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一个老年人，独自一人在智慧住宅里，和机器人相伴。

对于环境及其问题，可以采取类似的反思，一个区域的健康，对灾难性事件的适应力，其维护甚至是美学品

质，都需要一个社区的照料^[14]。如果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属于虚拟社区（指虚拟环境），那么他们往往会将与居住地的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后，他们没有照顾好它。当然，不再打理环境不仅由于在线网络和社区的扩展，其后果包括诸如抛弃城市外围地区，废弃山坡地区的水文地质灾害，面对灾难性事件的社会脆弱性，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还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交网络向虚拟形式的演进与人们放弃实体空间是相互促进的。应当说，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扩散所带来的高度负面影响并非不可避免。相反，正如我们将进一步看到的那样，它们还可以促进社区的复兴和对地方的照料。

为了朝这个方向前进，不仅需要更新社区的概念，而

[14] 适应力的概念在本书中多次出现，因此需要更仔细地定义。适应性是系统应对压力和故障时不会崩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对于社会技术系统而言，是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因此，应将其视为任何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当面对各种各样的危机和灾难性事件，我们当代社会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时，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到适应力。因此，正是由于该术语的使用变得如此广泛，所以必须仔细讨论和理解其含义（另请参阅 E. Manzini, *Error-Friendliness: How to Design Resilient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 Jon Goofbun (ed.) *Scarcity: Architecture in an Age of Depleting Resources* Wiley, Hoboken 2012）。

且需要更新社区与地方之间的交互的概念。我们必须从一种精神形象转变为另一种精神形象，从一个内向型社区和地方转变为生活在不同类型空间中的多样化社区，从而产生多种多样的地方。因此，如果我们还希望将社区与地方进行链接，那么我们需要为此创造条件，换言之，我们需要可以进行面对面交谈的社区，这样同时也有了照料环境的理由。这并不那么困难，任何目的社区的目标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一起做某事（共享空间，种植同一个花园，合作以共同照料儿童和老人），因此必然会谈论这些事情所发生的环境，从而有助于将其转变成一个地方。

当社区以这种方式运作时，为了强调其在地方产生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称其为地方社区，这是一种目标社区，其存在的理由包括照顾自己所在的地方。与所有当代社区一样，这是一个开放、轻松、意向型的社区。它产生的地方也是如此，这并不仅仅因为“一直存在”而存在，而是因为有人特意做某事使其存在，换句话说，意向型社区产生了意向型地方。

轻盈

有意义的相遇及其赋能生态系统。如何建立地方社区？如何创建面对面相遇的场合，使人们在彼此之间以

及与居住地之间建立关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为什么人们总是隔着一定距离在去地域化的虚拟社交网络中生活，甚至连附近的人也很少见面（因为他们的日程安排和生活方式不同）？这类问题促使伦敦艺术大学从2014年到2016年组织了一个设计研究计划“适应力文化（Cultures of Resilience, CoR）^[15]”。该计划包括由伦敦的多组大学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团队在伦敦开展的项目，这些团队关注并讨论完全陌生的人见面和分享活动的方式。与前几段中阐述的社区概念一致，人们一致认为这些相遇（被称为有意义的相遇）是开始建立新社区的分子要素。成为关注焦点的13个项目具有不同的主题，采纳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社区图书馆、为有精神问题的年轻人提供支持服务、监狱

[15] 适应力文化（CoR）是伦敦艺术大学在2014年至2016年之间开发的一个研究项目。其目的是树立文化在创造适应力系统中的作用的多重视野。在Ezio Manzini和Jeremy Till的协调下，该项目吸引了由20多名教师和研究人員组成的团队。在第二阶段，它审查了伦敦不同地区的许多研究团队与各种社会活动者合作开展的13个项目。研究路径的结果之一是讨论这些项目如何帮助人们与地方联系起来。这些活动的一些结果可参见：Ezio Manzini, Jeremy Till, *Cultures of resilience* (London:Hato Press, 2015, <http://culturesofresilience.org/wp-content/uploads/resources/CoR-Booklet-forHomePrinting.pdf>); and on the website: <http://culturesofresilience.org>.

中的活动以及与老人的艺术表演。但是，在这些截然不同的行动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组观察结果证实了社会创新设计的所有经验，即不可能直接设计和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创造专用的人造环境，可以有利于互动产生。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通过为明确定义的活动创建支持系统（技术术语：通过创建赋能系统）^[16]，或通过使整个环境更适合于未被限定的各种相遇、对话和行动（技术化表述：通过创建基础设施，即基础设施化）^[17]。

乍一看，大多数CoR项目似乎都采用了第一种方法。但是，仔细观察，情况似乎更加复杂，特定项目（产品、服务、专用场所）所取得的成果以后可以在其他项目中使用，从而成为空间物质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同样，由特定行动产生的关系价值往往保留在产生它们的社区中，成为社会公地，它们构成了社区可用于自身再生的基础结构的关系要素。因此，两种方法之间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

[16]Ezio Manzini,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5), p. 167.

[17] Pelle Ehn, "Participation in Design Things," In *Proceedings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Confer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

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新的协作项目的诞生和传播变得更有可能。反之亦然，新项目的诞生和传播，以及它们产生的关系价值，创造了社会公地，这些公地又成为更好的关系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反之亦如此，如果未能创造关系价值，那么其带来的怀疑主义可能会蔓延开来，并在环境中积累，使其对以后的计划不利）。概括这些观察，我们可以说相遇、对话和行动发生在社会技术生态系统中，其中，每一次相遇的质量与所处环境的质量建立起（良性或恶性循环）双向联系。

在第二组观察中仔细研究了何种相遇的质量能够促使项目形成。这尤其与不同对话者之间的相遇方式有关，这些对话者至少在一开始不认识彼此。项目团队的许多成员观察到，这些相遇发生在参与者常规的舒适区之外。似乎每个人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处于陌生的境地。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为了让陌生人见面并建立真正的关系，每个人都必须在同一条船上——所有人都感受到相同的脆弱性（一定不能有一些人感到宾至如归，而其他人则不会）。此外，正是因为接受风险而对陌生人开放，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变得脆弱，这才给相遇带来了关系价值。确

实，建立关系意味着开放和因开放带来的脆弱^[18]。

它在两个相对的倾向之间产生了张力，一方面，我们希望发生具有关系品质的相遇，另一方面，我们担心有品质的相遇所要求的承诺以及由相遇而带来的脆弱。

这些项目针对这些矛盾制定了不同的策略，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试图将脆弱性这一前提条件与某种保护措施结合起来。因此，它们通过创造相互脆弱性的条件来激活相遇，但是却使它们发生在安全的地方（如项目团队所称的低风险地方），受保护的环境，其中“冒险”可能会为所涉及的参与者所接受。

这种观察发现了与赋能系统的特征有关的新东西，如果我们希望相遇更有可能也更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能导致协作行动），并且具有高质量（从它们产生的关系价值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具有在对他人的开放感（并承受随之而来的脆弱性）与保护感之间取得平衡的敏感性。关于如何操作，没有固定的规则，我们只需要具

[18] Cipolla, Carla M. (2004), Tourist or Guest—Designing Tourism Experiences or Hospitality Relations? in Willis, Anne-Marie (edited by),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Collection Two*, Team D/E/S Publications, Ravensbourne, Australia (<https://doi.org/10.2752/144871304X13966215067912>).

备适当的敏感性和设计文化即可。

与陌生人相遇。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重点介绍从CoR计划中汲取的另一个教训，我们总结为，为轻盈提供价值。讨论的项目都是由学校共同推动的。因此，工作组始终包括学生，作为社区成员，这意味着其成员身份不可避免地是临时的。首先，这被视为对项目及其潜在成果的限制。但是，一旦明确了这个问题，其结果就很明显，社区包括临时居民（在我们的情况下是学生），但也很可能是临时项目工作者、游客或移民，这绝非例外。因此，所讨论的案例及其所产生的相遇可以看作当下社会的象征，在这个社会中，出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在流动，陌生人之间的相遇与我们所知的相遇是短暂的应该被认为是新的规范。

然后，我又要来问问我们不停问自己的问题，陌生人之间的短暂相遇能否有助于建立地方社区？如果是这样，它们的质量是什么？CoR研究团队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短暂的相遇也可以具有关系特质，并且可以与某个地方建立联系。另外，它们可以帮助更稳定的居民了解如何将正在流动的人们（意味着新居民或临时居民）纳入现有的本地社区，从而使其更加充满活力和开放。在我们的案例中，从实践经验中得到的观察，可以进行总结。参照马

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 的概念, 我们知道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 弱链接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它们使整个系统更加开放并能够沟通。格兰诺维特写道, 当弱链接太少时, “信息是自包含的, 经验不能交换”^[19]。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CoR项目的经验之一是“给轻盈赋予价值”。轻盈的价值是理解 (并促进) 流动世界中社区的关键, 新社区对新人和未知人开放的互动, 既轻便又灵活, 并产生关系价值。

轻盈的价值。我认为, 这里提出的与轻盈有关的想法可能有益于激发对新社区的讨论。但是,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给“轻盈”一词赋予比通常所赋予的更深的含义。为了阐明我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一下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在他的《下一个千年的六个备忘录》中赋予它的含义。在1988年出版的这本书中, 卡尔维诺提出了5个词, 表达了他对21世纪的渴望。首先是轻盈。卡尔维诺写了25页, 阐述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其中还给出了大

[19] Mark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no. 6 (1973), 1360 - 1380.

Joon Sang Baek, "A Socio-Technical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Services: Designing a Digital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ve Communities," doctoral thesis, Politecnico di Milano, February 2011.

量文献参考。要理解这个术语对于一个流动的世界中出现的相遇、对话和社区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需要很多甚至更多的内容。但是卡尔维诺的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在这里更简洁地说出来。为了介绍他对轻盈的观点，卡尔维诺提到了罗马哲学家卢克雷修斯（Lucretius）的《自然论》，并写道：“正是在第一部伟大的诗歌作品中，有关世界的知识消解了世界的坚固性，导致对无限、轻盈和流动的感知……这诗歌是关于隐形、无限的意外的^[20]。”就卡尔维诺给出的术语来说，相遇和对话促成了轻型社区，但正是轻型社区为那些微小、轻盈和移动赋予了深刻的洞察，使不可见的事物变得可见，打开了新的可能性。

卡尔维诺明确地说，他对轻盈品质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沉重没有价值和品质。这仅意味着他对轻盈还有更多话要说。我们正在谈论的相遇也是如此。轻松的相遇并不是唯一可以丰富机会空间的相遇。但是，它们是当今更新的和更有潜力的，需要更好地理解其前所未见的性质。

[20] Italo Calvino, *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 and 9 (English version).

2. 生活项目：自主与协作

今天晚上，我在家里。在电视新闻上，我正在看着人们从海上而来，他们的眼中充满着希望的光辉——对新生活的希望。我想起了我很熟悉的往事，我在家里多次被告知，我出生于一个来自伊斯特里拉的难民家庭。1945年，我的父母不得不离开他们在波拉（Pola）的家，乘船横渡大海去到其他地方，可以让生活更好的地方。他们被迫离开，但要这样做，他们必须有一个想法，并找到实现想法的手段。简而言之，他们必须决定一个项目，一个伟大的生活项目，将所有后续工作都引向不同的道路。

为此，当我看着那些从船上下来的的人时，我不得不想到他们每个人都在那里，是因为像我父母一样，在必要性的驱使下，他们想到了一个项目并将其付诸行动，他们的生活项目。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因原籍国的不宜生存的状况而必须离开，通过一个项目来实现逃离的目标。逃离战争和饥饿的人们随波逐流，最终逃到了难民营，别无选择。其他人事件已为他们决定。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驱逐出境，一种完全由他人控制的生活环境变化。但是，对于自行组织穿越非洲和大海的旅程到达欧洲的人们而言，情况却并

非如此。就像我的父母经历过的一样，他们有远见，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或者至少试图做到这一点。

通过移情来理解移民，以此为开始讨论生活项目有很多理由。首先，如果不去提及当下正在发生的灾难以及我们目前对这些问题的无力应对，那么我几乎无法说出或写任何东西。其次，这与本书的内容直接相关。对我来说，“无根性”意味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设计或尝试设计新的生活条件的移民，以及默默承受一切痛苦的被驱逐的人们，这种矛盾似乎象征着更普遍的生存状态，普遍的无根性，流动的人彰显着无根性，地方、社区和旧的存在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危机也带来了无根性。从这里开始，就需要自主设计自己的生活，以避免被驱逐到21世纪的集中营，从难民营（其中充满了悲惨的生活）到破败的城市边缘，到我们被驱使进入的受保护的住宅和信息泡沫^[1]。

[1] 以我的经验来看，重新思考移民问题的必要性不仅是要解决所出现的紧迫问题，还需要引发对当代大都市所有居民状况的更广泛的重新思考。这是 DESIS UAL Lab 和 SILK-Social Innovation Lab Kent 在 2015 至 2016 年在伦敦组织的重塑移民项目的主旨。可以参考以下链接：Enma Barrett and Carla Cipolla, *Reframing Migration*, DESIS Network, 2016, http://www.desis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Reframing-Migration-REPORT_2016.pdf.

项目制作

项目、设计师和设计能力。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诸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2]等的社会学家认为，在现代性中，传统正在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在指导人们生活的惯例也消失了。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生活选择，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设计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整个人生故事。20多年后，这种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变得比以往更加明显。特别是，伴随着时常的挫折感，已经出现了各种尝试和努力，其动力并非自主选择，而是直接采纳了预包装的生活故事。

[2] 在90年代，这三位作者介绍了“反身现代性”的概念，其中包含了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许多问题，并讨论了它们如何演变。他们的一些相关作品是：Beck, Ulrich (1999) *What Is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New Delhi: Sag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Risikogesellschaft* 1986); Giddens, Anthony (1990)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Lash, Scott (1995) *Global modernities*. Sage.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些常用的概念，但是它们可以进行各种解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项目”和“设计”的观点，以及它们与“设计者”和“设计能力”相关的术语。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处理过了，但我认为有必要再看看一些关键点^[3]。“项目”这一概念内涵丰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适应了不同文化领域的许多定义。在我看来，在这个背景下，一个项目是一系列有关世界的对话和行动，其目的是使它更接近我们希望的样子。为此，需要进行设计，对事物的状态进行批判性的评估，想象我们想要事物如何，并拥有必要的关系系统和工具来转换它们——所有这一切都包含了它们的实际功能（解决问题）及其意义系统（意义构建）。

从项目和设计的这些定义中可以推导，“设计师”就是“项目制造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从事我刚才说的事情的人都可以被视为项目制造者。在这种含义下，设计师是有意识地干预世界的任何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

[3] 在我的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些段落中涉及的问题。*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 (MIT Press, 2015)。该书从设计专家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讨论。相反，本书讨论的是非专家，他们仍然需要以设计态度来面对生活。

集体，这意味着他们了解自己的意图和可利用的领域（实际上，意图以及可能的领域也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们稍后再讲这一点）。设计师的定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那些按制度运作的人员（我将其称为设计专家），还包括所有不是专家但仍按照上述方式行事的人员。使用上一章中介绍的概念，可以得出结论，进行设计的人是指参加各种对话（并因此参与到社会形态中）并在其生存环境的物理和生物环境中进行操作并采取策略的人，我们将看到，这是他的生活项目。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作为人类，我们被赋予了设计能力，一种复杂的能力，这又是由各种适合人类的能力组合而成的。它们是批判性意识（使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不可接受的事物）、创造力（据此我们可以想象事物的状态）、分析能力（识别和评估系统的局限性以及可获得的资源）、实践能力（通过实行动策略，可以在系统范围内充分利用可用资源，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象）。显然，与其他所有能力一样，最终的设计能力对于每个人来说也不尽相同，最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真正需要时可以使用这种能力，就必须加以练习。换句话说，设计能力就像唱歌，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天赋，但是如果我们练

习，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合唱团里唱歌。

话虽如此，我们必须强调，尽管在这种定义下，设计的活动范围很广，但设计并不能涵盖世界上的全部人类活动。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在久经考验的惯例下无意识地、程式化地执行任务，或者参考了没有选择自由的有限可能领域。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设计活动，至少在那时，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还不是设计师。设计行为与非设计行为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阐述。

常规模式的危机。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构建的，在构建过程中，人们赋予它以含义。这总是以两种主要方式发生，一种是常规方式，另一种是设计方式。

在常规模式下，参照着逐步演化并世代相传的意义系统，人们按照规则来完成和解释事物。这些约定构成了一种隐式的专业知识，一旦启动（模仿母版），就能获得。只要“一如既往”，就能顺利完成（无须解释），并被整个社区所获得。这意味着在社区内，每个参与行动的人几乎都会自然而然地同意该做的事情，而无须明确解释规则

和含义，在对话和行动中，也没有人认为手头的事情^[4]可能会有其他的处理方式。

像所有人类行动一样，惯例会随着时间而发展。然而，它们通过随后的调整来缓慢地进行，而无须质疑它们发生时所处的整个感知框架。因此，尽管就更广泛的时间尺度而言，它们都是认知假象，取决于人类的行动，取决于我们的生活规模，但它们似乎是一套无可争辩的，被视为准自然规则的规范。我们应该补充一点，只要可行，常规模式似乎就非常有效，它可以使各种问题得到快速（“一如既往”）且有效的处理（因为它结合了许多以前的经验）。但是，公约需要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才能发挥作用，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必须长期保持稳定（或变化非常缓慢），以使整个相关社区积累应对这些问题的隐性知

[4] 隐性知识是社会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它是通过模拟从大师传授给学徒的，没有正式的、明确的学习方法。对这个术语的反思有各种流派。对我而言最基本的一本是安德烈·莱罗伊·古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书（版权©1964 Editions Albin Michel，或法语版本 1964 *Le geste et la parole. Technique et langage*）。古汉认为，有能力的人的活动纳入了隐性知识，成为他们能力的准自然扩展，相反，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以及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和竹内广隆（Hiroataka Takeuchi）强调了他们所谓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识。这种隐性知识可能建立在几个世纪的历史基础上（例如很久以前的古老手工艺，或前现代文化中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一种情况是，知识可能是在最近才获得的，但是仍然有时间融入社会，从而产生了上个世纪才出现的新传统（例如基于新材料和新技术的手工艺，或这些年出现的新的仪式和行为）。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写道：“看起来很古老的‘传统’通常起源很新，有时甚至是发明的。”^[5]的确如此，霍布斯鲍姆举的许多例子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些新的传统而言，环境也必须足够稳定才能使其持久。当一切都迅速变化时，它们也往往会瓦解，失去指导人们生活和工作能力。归根结底，每当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积累解决问题所需的隐性知识并对问题加以解决时，常规模式就会停止运行，必须在设计模式下发挥显性知识的作用。

常规模式和设计模式这两种模式一直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前者胜过后者，这不仅在欧洲是这样，世界各地均如此。在所有应用领域中都是如此，从个人生活选择

[5]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itor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到大教堂建设。从文艺复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前所未有的问题出现了，科学的显性知识逐渐取代了约定俗成的隐性知识，最后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互联完成了其余的工作，使我们进入了瞬息万变、加速发展的后传统社会，正如Anthony Giddens和Scott Lash^[6]所称的那样。在面对新问题并在未知的环境中行动时，无论他们是否喜欢，人们都必须确定自己的意愿和行为，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实现或至少接近它。

困难、风险和机遇。在后传统社会中，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流动环境可以被看作一个项目网。有些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自治的体现——我们的选择自由。有一些则不是，它们是他人思考和推动的项目，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之关联，有时甚至被迫关联。

在这里，我想探讨前者（我们的自主生活项目）如何以及何时可以胜过后者，它们的发展如何以及何时可以帮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社会和环境。我应该从一开始就说这

[6] Giddens, Anthony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Beck, Giddens and Lash,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ash, Scott (1996) *Detradition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uthority and identity* (Cambridge, Mass.1996).

看起来多么困难，但我相信这并非绝无可能。我认为，惯例的终止可能为解放人类的能力提供空前的机会，对于个体而言，是就其个人自由度而言；对于社会而言，通过释放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资源的潜力，得到整体性的解放。

为了论证我的观点，我将首先讨论那些有其他想法的人，并将设计模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视为新自由主义对我们生活和思想的殖民化的一种表达。居住在德国的韩国哲学家韩秉哲（Byung-Chul Han）写道，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中，“我们在自我实现的幻想下自愿利用自己。这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对它的利用使生产力和效率最大化”^[7]。在韩所描述的世界中，我们被驱走去利用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力以及因此可用的设计能力来开发自己，常常使自己陷于无法实施的项目，然后由于无法实现的结果而感到愧疚（显然，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实际上却是被主流文化强加的）。

当然，我也可以看到所有这一切。我还可以看到，这

[7] Byung-Chul Han, *L'espulsione dell'Altro* (Nottetempo: Milano, 2017), p. 25; Vedi anche *Psychopolitik: Neoliberalismus und die neuen Machttechniken* (Fischer, Frankfurt 2014)– trad. Federica Buongiorno, *Psicopolitica* (Nottetempo, 2016).

种绩效压力趋向于使许多人退出游戏，走向自我边缘化，完全放弃制作项目。另外，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采纳别人提出的生活计划（如韩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者，或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新威权主义——后者的最典型例子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反动民粹主义）。所以，我也很担心。但是，我对总体框架的解释是不同的，上面概述的社会灾难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人们被迫去制作项目——试图去设计自己的生活，而是在于他们如何做，在于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和整个社会进行良好的设计。这部分是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行动的环境并没有帮助他们，而是相反，引导人们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为了抵消这种漂移，我们需要将长期存在的过程（人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更频繁地使用其设计能力）与实践中的实际存在方式分开。换句话说，我相信新自由主义已经逐步接纳并适应了这个过程，并将其塑造成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方式，从而提出并传播了一个对目标和方法双重有害的生活计划。成千上万的人为实现从未真正受到质疑的竞赛和竞争而苦苦挣扎，这种功能主义的、基于效率的设计方法是上个世纪的普遍现象。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它灌输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每个人都必须设计和规划自己的生活，才能实现由几个无可争议的参数决定的幸福

感，金钱、成功、权力和体力。此类项目的质量取决于实现其目标的效率。这是一个渐进的项目（一个不会使现有系统受到质疑的项目），是一个孤立的项目（一个不反对占主导地位的超个人主义的项目），因此，它几乎总是注定要失败的。还有数百万其他人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当他们面对可能导致的困难、失败和挫折时，决定退出，这群心灰意冷之人基于简化版的真实，决意实施反动和专制项目。

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采用设计方法可能会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它可以从重新定义事物的感知开始，它可以提出打破主流因果推断的目标。它可能会选择放慢脚步，跳出游戏规则，与他人合作而不是竞争，并以同理心的眼光看待所谓的潜在敌人。与通常提出的笼罩在笼中的黯淡未来相反，新兴的项目可能会开辟新的前景并开创未来。当观察世界的发展趋势时，这种立场似乎很幼稚。

也许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不认识到这种设计可能带来的机会，将有可能失去历史性的机会。此外，上一章提到的社会创新浪潮向我们表明，这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它告诉我们，完全有可能独立于主流思维方式和实践而开发项目，而且实际上许多人正在这样做。

项目、自治和新约定。那么，“自主项目”在当前背景下是什么意思^[8]？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打破主流思想和行为，超越游戏规则，决定与他人合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采用与主流方法形成对比的思考和行动方式。

在讨论如何以及何时发生这种情况之前，需要澄清一点：对于人类来说，自主并不意味着，实际上也不能够自我封闭，决定任何项目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从交织的对话中产生的，尤其是面向行动的对话。具有自主权的项目源于对话，这些对话将批判性分析、创造力和开放性等人类能力应用于世界和可能的未来。因此，进行自主设计意味着参与对话，这些对话使用这些能力来想象行为和结果，这些行为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所处的生活和运营环境无关。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则意味着我们参与的对话

[8] 人们正在讨论与“项目”相关时“自治”一词的含义。在战略设计研究期刊 (SDRJ) 的特刊征文中，Chiara del Gaudio, Andrea Botero 和 Alfredo Gutierrez Borrero 写道：在自治思想的基础上，我们问自己，当前研究和设计实践中，自治、设计实践与关系和公共逻辑及其存在方式的政治激活有何关系？(Call for papers: Autonomía | Design strategies for enabling design process, Special Issue of SDRJ - Strategic Design Research Journal, 2017)

没有呈现出这种进行批判分析的能力，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依附于别人为我们设想的生活项目。

就其要求的时间和注意力而言，我们必须承认，选择生活项目，并对其进行想象、设定目标是一项艰苦的努力。寻求自治的程度越高，斗争就越困难。因此可以理解，人们倾向于选择预先打包的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比喻成新的惯例，甚至是新的奴役形式（意味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系统的依赖）。其中一些是伟大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威权主义项目，如今这些项目被视为经济文化模式，我们被告知应当适应这些模式，仿佛没有其他选择（即使它们导致我们的社会和环境灾难正在越来越明显）。这些模型包括各种各样的存在和行动方式，简直就像是预包装身份认同的大超市，它的货架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成功的职业人士到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从缅怀过往社区的怀旧者到虚拟网络的居民。

这些存在和做事方式可以被看作伪传统，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们似乎都与传统社会中发生的事情相似（它们也提供/强加了一系列生产出大量预包装生活故事的惯例）。但是，旧的传统与新的伪传统之间存在一些根本的区别。与旧的做事方式不同，新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次性传统——是通过选择来采用的（尽管这常常感觉像是

一种强迫选择，但总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它们并没有为整个地方社会所共有（由于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同时存在各种可能性，它们会引起社会裂痕）；它们是某个人项目的结果（其动机和实施该方法的方式是公认的，而过去的做法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这些新传统可以降级为肤浅的时尚，当人们采用它们时，它们可能会深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极端甚至悲惨的后果。

随之而来的是，这种即抛式传统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交织融合在一起，提出了逃避现实复杂性的方法，并分散了思考和开发高度自治项目的可能性。我们如何应对这种趋势？我们如何才能防止由于实体世界传统的消失而释放的设计资源落入流动世界的新陷阱中？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自主权并触发集体学习过程？

显然，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如前所述，尽管有种种困难，但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积极的答复。我认为，在传统社会中被广泛忽视的设计能力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而现在，这种设计能力往往会被引入新的伪传统中。为了找到方法，我们首先需要更仔细地研究该领域的参与者，他们的动机以及他们寻求幸福和构想自己的人生计划的方式。

探索

能力、工具和结果。在公元前66年，老子写了《道德经》，这是道教的基本文本。他最为人所知的名言之一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译注：此引文至今未确认出处与作者，流传为老子所说。）2500年前，老子就已经提出了自治与幸福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找到了今天与当时同样重要的答案，为了持久的幸福，人们必须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可能性。但是，为此，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知识和工具。今天，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就是设计能力。

为了讨论这一点，我们将向后推进约2500年，迈向由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提出的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以福利的问题为基础，进而探讨幸福，这接近于老子的思想。森和努斯鲍姆并没有将人们视为有需求要得到满足的载体（因此将人们的福祉视为满足其需求的一揽子产品），而是建议将他们视为具有能力的参与者，使他们能够采取行动并取得成果，例如有足够的食物、住房和适当的衣服……能够自由移动，结识朋友并与他们建立关系，能够在公众场

合露面而不会感到羞耻，能够交流和参与，能够跟随自己的创作兴趣，等等。^[9]采用这种方法，一个人被描述为一个活跃的主体，能够通过设置自己的行动能力来寻求幸福。换句话说，通过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人们不仅被视为需求的载体，还被视为能力的载体。因此，它们不仅是他们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解决方案中的参与者。

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这种解释模型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使我们可以谈论福祉（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将重点从物质产品的可获得性转移到它们使我们能够实现的目标上。特别是，它使我们可以谈论可“自由”实现的目标，“免于（饥饿、气候逆境、不确定性、孤独）的自由”和“选择（在何处，与谁同在，如何工作，工作多少，向世人展示什么样的想法，以及看起来是什么样等方面……）的自由”。用本书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人们的福祉是基于他们的设计能力——他们设计生活的自

[9] Amartya Sen and Martha Nussbaum,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Introduction. 森和努斯鲍姆提出的观点变化影响了各个学科的众多研究人员。对于设计专家而言，这意味着不仅需要根本改变看待潜在用户的方式，还需要想象自己角色的根本改变，从识别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到不仅识别问题还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潜在资源，同时开发系统以促进和支持解决方案，而后者往往至关重要。

由——以及他们至少能部分地自主设计的生活。

总结一下最初的一系列讨论，我们可以回到故事的主角，可以说，他设计项目的可能性以及这些项目的质量将取决于积累和培养的设计能力（即他的批判意识、技能和能力、创造力以及积极主动和与他人合作的意愿）。但是，这显然也取决于他所生活以及工作的环境，一个可能或多或少有利于他使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并允许他运用能力以取得积极成果的环境。

人生计划像镶嵌术。为了更好地理解设计能力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回到生活项目，更加仔细地研究设计的实际含义。这也意味着关注我们的主角想到并或多或少地成功实现的生活项目。

从理论上讲，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故事的主角应该描述一个长期的愿景（有关他想要成为的人和做的事情的宽广愿景），并组织起来实现它，日复一日地根据需要确定细节。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和生活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没有长期项目，也只有非常模糊的项目，我们经常被迫制定日常计划。因此，往往是从这些探索性的应急计划中得出的经验引导着我们建立起对世界的愿景、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的长期项目。换句话说，是日常生活项目构成了整个生活项目的基础。因此，虽然为了方便起见，

我将继续使用“生活项目”一词，但从现在开始，我真正指的是局部项目，这些项目侧重于各个方面、问题和时刻。通过与他人交织，这些将触发整体生活项目。为此，人们会适应他们沿途发现的东西，重新解释它，并修改其含义和用途，有时甚至是其实际的构成要素。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就像镶嵌师。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Claude Lévi-Strauss）首先介绍了镶嵌师的形象，并在此将其含义与工程师的形象进行了比较^[10]。列维-斯特劳将工程师定义为根据一个精确目标进行设计的人，为了实现目标再确定实现的方法。相反，镶嵌师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他一直保持开放态度，并利用所发现的材料来决定如何实现目标（以及目标的最终形态和形式）。因此，镶嵌师也是有目标地行动，并且进行设计。但是，与工程师不同的是，他通过重新组合先前存在的材料来近似达到他的结果，他识别这些材料，去除材料所在的背景，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以修改其含义和某些细节。这种去除背景和重新解释的操

[10] Claude Lévi-Strauss, *La Pensée sauvage* (Paris, 1962). English translation as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1966). A bricoleur is a "Jack of all trades" or a kind of professional do-it-yourself person (Levi-Strauss 1966, 17).

作是他设计活动的基础，并在所有领域进行应用，从使用旧轮胎橡胶制作鞋底到将旧公交车改造成房屋。这种设计方法最适合在我们必须接受其复杂性的世界中运行，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个世界。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工程师式行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世界，或一个可简化的世界（从简化主义者的、机械的角度来看），在该世界中，设计师被认为能够了解一切，控制一切，并随心所欲地扭曲现实。设计师的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称之为造物主式的，在上个世纪盛行，直到今天仍然广为流传，尽管它的无效性早已显而易见。相反，镶嵌师模式及其与现实的对话态度之所以出现，恰恰是因为事实证明它们更适合在复杂环境中寻找方向。结果是，与现代思想所想象的相反，镶嵌术并不是设计的特例——一种较少的设计，事实恰恰相反，工程师代表了非同寻常的处理方式，即在所有信息都可获得，并且可以从中推断出最佳行动方式这一极简情况下适用。

因此，设计师、镶嵌师通过一系列发现，或者通过努力使它们成为现实来进行工作，事情（产品、服务、过程和想法）似乎很有用，并且可以用来创建自己的库房。另一方面，库房中的物件是根据其先前的功能来成形的，因此镶嵌师、设计师在满足这些要求时，可能会意识到一种

新的强大功能和表达潜力，决定赋予它们以特殊的作用，从而改变它的最终目标。或者，他可能选择完全不同的方式。换句话说，项目就像修修补补一样，是设计师与他发现的物件之间的持续对话。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对话项目，能够专心倾听现实，如果情况需要，可以重新确定自己的道路。

我认为正是这种对话的性质使得镶嵌师对于我们正在的生活项目格外有用。它使我们避免了由权力妄想和被动性撕裂开来的瘫痪鸿沟，要么否认现实，试图以一位造物主式的设计师的身份出现（带着所有可能的挫败），要么温驯地接受它，去适应似乎不可动摇的规则。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提出的方法需要承认和接受世界的复杂性，并结合意愿与能力，不仅要认识到这世界的局限性，还要认识到它所提供的机会，以此来应对世界。它鼓励我们将事物视为可转变的，其第一步就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们，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和新的功能。

一位能干的镶嵌师知道如何通过听取事物和人们的声音来进行设计，认识到他们可以为前行的道路做出贡献。为此他需要什么？首先，他需要一个库存充足的“仓库”，存放可能有用的物品。对于生活项目，该仓库包含着他所参与的社会、技术、文化和政治生态系统中可以找

到的丰富和多样的东西，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还包括思想、计划、做事方式和正式的方法论。然后，他需要内部资源，可以用来制定和评估项目的知识和价值，以及从中得出的结果。

我们将从最后一点继续。从传统模式（遵循传统做事情）到设计模式（做出自主选择）的转变需要扩展我们的个人责任，设计总是意味着做出价值选择，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根据善与恶的区分标准进行评估，做出有道德的选择，这并不容易，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自己做出的每一个设计选择中，独自一人而无须借助惯例，就区分好与坏？显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镶嵌师式的设计师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复杂性和个人责任感。我现在提倡的设计方法的文化背景是接受复杂性并对其积极评价。这意味着不仅要接受人类活动的每个结果都是暂时的和可逆的，而且我们对世界的行动将始终具有不可预测的影响（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从长远来看，实际结果及其影响的范围将是什么）。这也意味着接受设计人员与其项目结果之间始终存在双向联系。这意味着设计师从不外在于他所作用的系

统，或者简而言之，就是设计设计了其设计师^[11]。我认为，意识到这一点，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全知全能的，可以减少绩效压力带来的风险（当面对设计一个项目的责任时），并使我们的设计活动更加人性化，能够想象和行动，但同时要意识到人类世界认知的有限性。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中的小生灵。但是，我们可以做些事情，并对我们的选择负责。让我们仔细看看。

将世界视为不可简化的现实，有助于重新定义我们作为人类的角色。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即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发挥重要但不确定的作用。换句话说，在复杂性中，每个主观性都有权重，因此也有责任，但是没有哪一个主观性能够支配整个系统。因此，如果每个人都有责任，则没有人承担所有责任。

我认为这句话很重要，但可能会被误解。我的意思是说，当处理复杂的问题时，认为执行者对他所做的事情负全部责任在理论上是不可持续的，就其本质而言，复杂系统的观点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从中收集所有信息，因此没

[11] Anne-Marie Wills, *Ontological Design—laying the ground*,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Collection Three (https://www.academia.edu/888457/Ontological_designing).

有人可以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无论复杂系统中的行动者是谁，他都必须要在道德上对背景敏感（如亚当·索普和洛林·加曼^[12]所说，我们可以“回应”）。他必须从对世界的观察和行动的角度出发，对自己能看到和做的一切承担责任，相信别人也会从他们观察和行动的角度出发，做出同样的选择。最终，在复杂的系统中，责任只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果。当然，运用这种能力进行合乎道德的响应的范围扩展到我们从自己所处的角度可以看到和行动的一切。这远远超出了根据我们在所属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应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死亡集中营的厨师应对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负责。尽管他的任务只是做饭，但他拥有识别自己在什么环境下以及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所有必要信息。

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观察。我认为它也具有重要的操作意义。归因于一个执行者，令其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有全部责任（如果认真对待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失败。或者，这可能会导致冷漠，如果我们不能承担所有责任，那么我们也最好不要承担任何责任。另一方面，采取符合道

[12] Adam Thorpe & Lorraine Gamman (2011): Design with society: why socially responsive design is good enough, *CoDesig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 Creation in Design and the Arts* 7, no. 3-4, 217-230.

德规范的态度意味着能够理解自己的环境，认识自己行动的可能性（包括当时超出正式身份的范围），并承担全部责任。

探索和改变可能性领域。每个项目都应被视为对可能性领域的探索（准确地说，根据我刚刚写的内容，我们应该说对什么是公正、公平和可能的探索。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假设，在我们将要讨论的选择中，可能性的极限也由道德上可接受的东西来定义。我的意思是，做不公正、不公平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因为尽管可以确定该领域是有其局限性的，但它永远不可能被完全了解，像现实的每个方面一样，它也具有复杂的性质，并且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再次使用镶嵌师的隐喻，我们可以说，可能性领域受到潜在可用物品的性质和尺度的限制，但设计师无法确定其库房中是否包含所有材料，因此无法完全了解其可能性的最大限度。如果他要更仔细地观察，他也找不到其他东西；第二天他也无法想象，他已经拥有的旧物件有了新用途。

换句话说，可能性领域是给定社会的自然、文化、经济和技术允许在给定地点和时间完成的一切。它包括每个受试者理论上可以在其中移动的自由空间。简而言之，

可能性领域是并非不可能的所有事情，而行动领域是一个个人认为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资源付诸实践的理论上的可能的部分。因此，它由每个主体认为自己可以拥有的自由空间组成。

出于这个原因，生活项目是根据一个人在他所认为的行动领域内做出的选择而产生的，因此他可能有两种补充方式来扩大其选择范围。首先是通过改善个人资源（能力、技能、兴趣和创造力）来扩大行动领域，并由此获得更大的理论可能性。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减少对象与之交互的系统的技术、法规、财务和文化限制来扩大他的可能性领域。通常，假定从基层即从我们主角的位置可以进入的唯一道路是前者。后者需要改变系统的限制，因此需要从顶层进行外部干预。乍一看，这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可能性领域也可能是被迫的，这意味着如果当我们的主人公像一位技术高明的镶嵌师一样，在局部系统中重新诠释某些元素的含义时，或对其进行修改以适合自己的目标时，系统就从内部和基层延伸出去了。

当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讨论的自治项目并非别无选择地、被动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可能性领域，而是会对其进行修改。显然，这些旨在从内部和从底部向上改变可能性范围的行动如何有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取决

于许多因素。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主人公越努力与他人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协作

协作项目和自主权。到目前为止，在谈到生活项目的社会维度时，我一直指的是由社会网络支持的活动，但其目的是实现本质上个人化的结果。现在，我想集中讨论一个人的生活项目与其他人交织在一起，从而实现协作和成果共享。

考虑一下，例如，我们的主角选择参加一个住房项目，或者他是一名植物爱好者，决定参与打理附近的花园；或者他患有糖尿病，加入了一个病友互助小组。在每种情况下，参与活动的人员都将离开他们自己的角色（消费者、客户或用户），成为主动的合作者，以解决他们自身面临的问题。这样，他们的生活项目便会融合在一起，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交织，开展协作^[13]。这意味着一项活动中的每个参与者都通过与他人合作来取得结果，这种结果无法独自完成；只有在其他参与者同时达到类似结果的情况下，这一结果才能实现。

[13] Richard Sennet, *Together: The Ritual, Pleasure,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回到上面提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协作生活，可以创建自我管理的托儿所、老人服务、团购组织以及邻里体育和娱乐活动，而这原本是无法想象的。同样，通过在小区花园中一起工作，植物爱好者可以享受的不仅仅是阳台上的花盆，或者，患有相同疾病的人们可能获得比常规卫生服务更好的帮助和支持，从而解决日常难题。因此，概括地说，我们可以说，通过采用协作方法，我们的主角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这是因为协作修改了其运行的系统，不仅扩展了其行动范围，还扩展了其可能性领域。然而，毋庸置疑，要想象并建立自己的协作生活项目，就必须远离仍然主导着当代社会的愤怒的个人化过程，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在文化层面上造成局部不连续性。由此可见，除了展示协作的力量及其为解决原本困难的问题提供的可能性外，此类协作项目还表现出更高的自治性。的确，尽管个人生活项目及其需要的实际程序需要努力挣脱大型主导项目的约束（那些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将每个人笼罩在他人强加的日常生活中，而个人主义既极端又无能），但是协作项目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变得更加自治。最终，当一个人同意与他人协作并共同努力时，就可以实现最大的自治权。结果是自治与协作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也在变强，反之亦然。

以协作生活为例。在谈论生活项目时，我考虑了两个极端，这可以看作两极分化必须完全个人化的项目和明确合作的项目（如前文中提到的社会创新示例）。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所有人类行为都沉浸在互动和对话的网络中，因此始终会有一定程度的协作。因此，在两个极点，即个人项目和明确合作的两个极点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可能性，需要所涉及的参与者进行不同程度的参与。因此，对于协作水平较低的项目，我所说的关于明确协作项目的说法也将是正确的，尽管程度较低。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将提到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生活项目，尤其是那些与协作生活有关的项目。

协作居住是指在自组织、互助、友谊和邻里的总体理念框架内，包括共享空间和服务在内的家庭、邻里和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个想法似乎绝对显而易见，在所有的住房文化中，在每个历史时期，人类都创造了共同生活、共享和合作的方式。因此，没有必要调用任何特殊类型的设计功能。但是，如果这个想法今天被提出作为社会创新的基础，并且是特殊设计能力的成果，那是因为沿着这条线的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些事情，这消除了当代社会进行合作的明显性。

如今，有关福祉（寻求个人自由和隐私）、人口结构

（家庭危机，人口老龄化）、工作方式（工作不安全感和失业）、时间观念（似乎永远不够）和不安全感（由于害怕他人而宁愿隔离）往往会产生一种生活方式，其特点是越来越孤立，并且丧失了协作能力。结果是，以依赖技术支持的孤独生活为标志的主流趋势，通过虚拟社会服务和网络支持的孤立生活。另一方面，在科技产品的辅助下，这种孤立的生活无法满足人们的许多实际的、心理的和文化的的需求。此外，它并没有使这些孤立的人们产生必要的凝聚力，以克服面对未知和当下灾难时的深深恐惧。

因此，幸运的是，人们用各种截然不同的行动方式来质疑这种孤独的生活，包括可以重新发现协作价值的行为方式，并找到将其付诸实践的方式。这些活动是产生协作生活创新实践的基础，在这里我们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考虑的是应用卓越设计能力的结果。

我们今天谈论的协作生活不是这样的。如今，其起点是一个开放的，甚至有意含糊其词的想法之后的操作性协议，主要涉及邻里关系和互相协作，一群个人和家庭讨论如何更好地共享某些服务并建立良好的相互关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喜欢彼此接近并分享对某些东西的想法。但关键是他们真正选择一起做的事情以及如何去做。整个建议都基于这一点，从这里可以

得出他们正在做什么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换句话说，虽然基布兹和公社都是在不同背景下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并产生了基于共同的强烈意识形态信念的社区）的象征性生活项目，但协作生活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协作生活中，人们设计了自己的生活，并且已经产生了同样空前的社会形式，实质上的21世纪后意识形态社区，这种社区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务实对话的机会空间，在其中讨论人们可以做什么，以及愿意一起做什么。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介绍由米兰理工大学 DESIS 实验室与各种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一项设计研究计划，该计划始于10年前，至今仍以不同形式、不同路线在行动，并以各种社会行为者为主角^[14]。该计划的第一阶段集中在住房上，一群家庭决定自主生活在彼此附近，共享空间和服务，并自主决定共同居住的规则以及与当地社区和整个城市的关系。

[14] 米兰理工大学 DESIS 实验室于2006年启动了协作式居住（Abitare Collaborativo）计划。与一家社会企业合作开发的首个项目在米兰产生了各种集合住房计划，并为意大利的其他类似活动提供了样板。最初的活动催生了更多的工作领域，启发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以及致力于协作生活领域的其他社会企业的发起。

兴趣社区和目标社区。当该计划于2006年启动时，集合住宅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兴起了一段时间。因此，第一步是深入分析现有案例，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真实情况，包括它们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结果表明，尽管人们对该想法有强烈的动机和广泛的兴趣，但其现实实现却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结果是实际运行的案例数量很少）。换句话说，人们表达了他们希望将其开发为项目的想法，但是出于各种原因，这没有发生。

因此，该计划将其自身的任务设定为创建一个有利的生态系统，以促进这些假想项目的实现，目的是支持和发展人们的设计能力，减少人们原本会遇到的障碍。为此，分析了潜在需求以及将计划转化为行动如此困难的原因。由此，从直接相关人（未来的共同房主）的视角出发，确定了三个主要困难：第一，与对该项目感兴趣的其他人建立联系并使得大家能够同时开始；其次，寻找合适的土地用于建筑，或找到合适的建筑进行翻新，并就与购买相关的行政和财务问题进行谈判；第三，协同设计共享空间及其协同管理所需的活动。人们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克服这些困难。

首先是创建一个广泛的兴趣社区，一个由数字平台和房地产市场专家团队支持的轻型社区。该平台使对项目感

兴趣的人们能够相互联系，并且房产专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使大家关注可能适合某个集合住宅项目的可用建筑物或土地。这个社区聚集了数千人，几乎全部是在线交流。我说几乎全部是，因为尽管它的日常功能是线上的，但出于文化和社区建设的目的，也组织了一些线下活动。

对于这个社区，我们应该注意到，出于各种原因，专门设计的数字平台至关重要。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此工具的特殊性使社区能够聚集许多可能感兴趣的人，而如果没有它，这些人将永远无法互相接触。换句话说，这是数字工具的功能，在一些社区中，它是可有可无的支持工具；在某些社区中，则是社区存在的前提。第二个更明显的原因是该平台扮演了组织工具的角色，用于协调活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还充当了沟通工具，将集合住宅的观念传播给了更广泛的公众；给这种生活方式竖立了正面的印象；提供一些案例，感兴趣的人可以与之匹配，并比较自己在相关主题上的个人想法。

从这第一个伟大的社区诞生了其他较小的社区，每个社区都专注于特定的可能的建筑物或建筑区域。这些是旨在创建一项特定住房计划的目标社区。该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和三个不同的社区计划。首先，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潜在共同所有者群体。其目的是验证参与者的实

际兴趣，在其中彼此分享该如何操作的最初想法。在第二阶段，小组合并并确定了共享空间和协作开展的活动。每个社区还创建了一个正式协会，以决定其章程和建立睦邻关系的规则。最后，在第三阶段，社区（现在是正式的协会）向外部团队宣布其自治权，并接管了日常活动的管理和协调。这三个阶段的活动主要是在线下进行的，但是在专用的数字平台的支持下可以进行在线活动。促进和支持该计划的专家团队一直都带着特定意图和宗旨参与社区，但其成员随着时间而变化，这些专家有着项目各个不同阶段所需的不同专业知识（尤其是传播、新媒体、室内建筑和服务设计专家，都具有跨学科的协同设计经验）。

赋能生态系统和设计联盟。如上一章所述，在所描述的案例中，兴趣共同体和目的共同体起着互补的作用，如果没有第二个（目的共同体），第一个（兴趣共同体）则有可能陷入理论和原则的泥潭，无法影响实践。反之亦然，目的社区如果不与兴趣社区发生联系，在兴趣社区中积累经验和进一步的思考，就有可能缺失关键的文化背景，在此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不切实际的道路，有可能丧失道德、社会及环境价值，而最初的想法恰恰是由这些价值启发并推动的。

因此，正是这些行动共同产生了“受支持的集合住

宅”，这意味着一种住房类型，这要归功于赋能生态系统（如各种社区、专家支持团队、数字平台、共同设计工具和服务共创），各个参与者的个人生活项目可以更轻松地发展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产生原本很难创建的协作形式。

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情况如何，就会出现一个对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开放、轻便的居民社区与负责项目设计和管理的更紧密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也是社区的一部分。在集合住房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标志社区是如何诞生和存在的，这要归功于某些积极主动的社区成员。这些人独自或与专家合作，作为活动的设计者、管理者和生产者，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引领着他们所属社区的建设、管理和再生。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积极分子组成的群体不是固定的，其边界是可渗透的。我的意思是，组成这些小组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积极分子（因此是设计联盟的一部分）与不积极的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换句话说，它们是社区及其生活方式的直接、动态的表达，而不是巩固的权力集团。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在这个小组中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扮演专家角色。这些专家的人数和性质可能因不同案例而有所不同（在我们的案例中就是如此）。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观察结果。集合住宅的案例证实

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话（第1章），当代社区是交织在一起的对话的结果，这些对话以轻而易变的方式链接了共同的主题和问题。为了持续下去，这些社区必须有一个设计联盟^[15]，所谓设计联盟，是指来自社区内部或外部的人们，而这些成员会随时间而变化。

这些人往往受不同因素激励采取行动，但是对于要实现的结果却有着共同的想法，并且他们共同拥有将自己的决定付诸实践的技能和能力。组建这些联盟并使其保持活跃，同时保持与小组其他成员之间有开放和动态关系，对于每项协作活动的积极运转至关重要，对每个社区而言都是如此。

总而言之，一个好的赋能系统是使各个人都有可能参与协作活动和社区生活的系统，人们在系统中往往以不同的方式以及不同程度的承诺和责任来实践。有些人可能会积极参与社区提议的活动；在定义活动本身时，有些人可能是积极主动的（这使社区本身保持活跃）。通过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参与方式，这种赋能生态系统可以开

[15] 这里使用的“设计联盟”一词还包括了最初的、严格设计的联盟，之后演变成在项目执行和管理阶段运营的联盟（将“设计”一词扩展到后期阶段的合理性在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流动的世界中，这些阶段也具有相当多的设计要素）。

发、催化和系统化潜在的可用资源。但是，这样做不仅必须为人们提供参与的可能方式和时间，它还必须传递一种文化，从而与多样化动机保持一致，和/或激发新的动机。

协作和关系价值。如前所述，对可获得的实际结果的兴趣并不是我们的主角和其他相似的人着手基于协作实践来开展生活项目的唯一原因。其他好的原因还在于，正是由于强调协作，这种项目重视友谊、信任和同理心。友谊、信任和同理心是关系价值^[16]，满足人类需求的无形资产与有形商品同样重要。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种情况如何发生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共同的目标并共同努力实现目标时，就会出现关系价值。因此，真正合作的生活项目也会产生这种价值。另一方面，必须说合作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价值并不是免费的。它们最明显的代价是组建团队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此外，协作需要与他人协商以及确定何时一起行动，而这可能会因其限制个人自由（或个人对自由的想法）而成为行动的代价。

[16] Pierpaolo Donati, *Teoria relazionale della società* (Milano: Franco Angeli, 1991); P.L. Sacco, Stefano Zamagni, *Civil economy, cultural evolution 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enquiry* (Bologna: Università di Bologna, 1998).

最后，协作需要对他人开放并具备开放的意愿，一方面是使这些互动更具人性，另一方面，正如上一章所述，协作会带来情感上的需求，正因如此，协作并非能够轻松实现^[17]。随之而来的，因其对时间、注意力的要求，以及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这些预期成本阻碍了协作的形成。我认为，在每种情况下如何平衡实现性和关系质量是开发每种协作社会形态时的主要设计问题。

支持性集合住宅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集合住宅最初是因为一群有动机的人们生活计划，他们准备应对在相对消极的环境中的不小的困难。因此，只有少数特别专注于此的人才可以实现此类项目。但是，通过创建有利的生态系统进行的支持性集合住宅，使该项目向更多人开放（向拥有较少时间和精力的人们开放），并且通过维护和再生初始价值来实现这一目标。当支持性集合住宅的概念扩展到各种社会住宅项目中的协作生活

[17] Carla Cipolla, *"Designing f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al Qualities in Services"* doctoral thesis, Politecnico di Milano, 2007; see also Carla Cipolla and Ezio Manzini, "Relational Services,"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22 (2009), 45–50.

时^[18]，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在这些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是增加可获得性，同时保持关系价值的产生；为个人生活项目提供了与集体行动相融合的可能性，在以下两个相对方面之间取得平衡：可获得性，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质量。

我将在下一章中回到这一点。目前可以说，在协作解决方案的发展轨迹中，使其更易于获得是正确且重要的——因此，在所需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方面要求更低；施加的时间限制不那么严格；能更好地调节其所基于的交互关系强度。但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时，我们必须确保所有这些方法都不会失去其最初的协作性；直至产生关系价值的能力。相反，我们可以说，这些关系价值的产生将被视为成功的协作解决方案在各个阶段不断成熟发展的质量的最佳显示。

可持续日常生活的愿景。除了到目前为止提到的所有

[18] 集合住宅基金会 (Fondazione Housing Sociale, FHS) 吸收并发展了支持性集合住宅的经验：FHS 是一家致力于意大利社会住房发展的机构，该机构在其住房计划中纳入了协作式住宅的概念，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它已经使用并进一步开发了以前的集合住宅项目中产生的各种想法和设计工具。Giordana Ferri (ed.), *Starting-up communities. Un design-kit per l'abitare collaborativo* (Milano: Bruno Mondadori, 2016).

内容之外，协作项目及其活动还导致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不连续性。确实，这些结果导致他们勾勒出与主流思想所描绘的世界不同的愿景。从前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每个案例在重新定义当前流行的感知系统和创建新场景时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权。因此，任何选择参加集合住宅的人都表明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生活方式。同样，任何打理社区花园的人都会展示出另一种思考和管理城市的方式；任何组织互助小组的人都会介绍有关“关爱”的新观点。最终，任何构想和发展合作生活项目的人，不仅为自己和他所参与的社区取得积极的成果，而且参与了更广阔的愿景，基于可持续的生存和行为方式的新文明。

所有这些对于下一章我称为日常生活的政治而言都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这种政治本身还不足以将世界移出它目前因循的灾难性轨迹，但很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

3. 日常生活的政治：设计行动主义和转型常态

20多年前，当我们来到这里居住时，当地的水果和蔬菜很少见。除非这个家庭中有一个老人仍然留着一个菜园，否则买来的水果和蔬菜都不知道来自哪里，就像在城市里一样。但是我们在乡下，这里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在过去，除了一些极其特殊的例外情况，食物生产和消费的观念已经与该地区和季节的自然循环失去了联系，这种趋势席卷了这个农业地区。

20年后，在同一个地方，不再难找到当地的水果和蔬菜，“带盖儿的农贸市场”^[1]每天开放，由当地农民（70个农业企业和农业食品生产者）经营，质量好，价格公道。农贸市场进出容易，生产、销售和购买这些产品已经很正常。

在我看来，这种常态性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在这里，“政治的”这个形容词表示某种影响政策的东西，对社会技术体系的塑造及其内部力量的平衡。在这个市场上

[1] 带盖儿的农贸市场 [Il Mercato Coperto degli Agricoltori, Montevarchi (AR)] (<https://www.facebook.com/ilmercatalemontevarchi/>).

买卖意味着每天保持活跃的生产和消费来抵消当时的流行模式，这是一种协作方式，表现出高度的自治性（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一种理解食物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地方与社区之间关系的方式，使人们找回了似乎早已忘记了的地方性观念，一种与大规模、大众市场、工业化农业的主导逻辑相对立的方法。

如今，在思维及行为方式之间的新旧观念的冲突在该地区似乎不再那么明显，因为如前所述，这种本地化模式已得到令人满意的整合。但是，这是与系统变化协作的常态，一种变革性的常态，其存在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平衡（在经济方面以及在权力和知识方面）。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变革性常态是社会和文化行动主义的结果。10年前，在当地农民的倡议下（我所说的珍贵例外），与慢食协会和蒙特瓦尔基镇议会合作，目前的农夫市集开始应运而生。由于几方的积极推动，农夫市集的第一个原型才可能出现。当时只有每个月的一个星期天开放，它不仅是市集，同时也是节日和文化活动。这也是一项强烈的政治宣言，支持由倡议发起人和以各种其他方式参加的人所提出的与目前主流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相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种激烈的活动方式激发了潜在的兴趣，从食物开始，这些行动让人们看见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做

事方式。在实际层面，一系列的市集活动在当地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联系（当时仍具有很大的潜力），并开始创造出最初的供需模式。没有过往行动主义和创造力，当前的变革现实是不可能的。

继续讲这个故事，我们将看到，要想实现到今天存在的农夫市集，就必须完成一个微妙的转变，从最初的英勇阶段开始，即一群富有热情、天赋的创造力、管理技巧和实践精神的人，建立了第一个市集原型——到了赋予市集连续性的阶段，这需要现实主义和政治意识的馈赠。这种变化对于将最初的事件转变为稳定的现实是必要的，这是许多人每天都能轻松光顾的市场。

行动

日常生活制定政策。从最初的以行动作为政治的最初阶段，到日常生活作为政治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在这一时刻许多此类举措都失败了。最初的行动者，是那些想象并创造出全新事物的社会英雄，他们往往从一己之愿出发，最终妨碍了项目自身，并有效地阻止了那些高度投入的初始小组的参与（直至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或者相反，该倡议可能会渐渐发展为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以效率为名，完全丧失了其最初的价格。

值，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所基于的服务理念也演变为新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像其他类似的例子一样，我们所看到的农夫市集向我们表明，存在第三种方式，介于封闭的少数群体和向新的自由主义过渡之间。因此，这是一个探讨如何以及何时发生的问题。需要做出什么选择以及采取什么日常生活政策。蒙特瓦尔基农夫市集向我们展示了发起人如何引导最初的倡议变成行动，并且在经济效益与社会和环境价值之间找到了可行的平衡。显然，对于所有社会形态，没有人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如何演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它使当地的小农户得以生存，许多公民也意识到并认可了他们的产品质量及其对当地经济的价值。

因此，本案例告诉我们，像蒙特瓦尔基的农民和当地居民这样的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选择，这些选择不仅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以他们的实际榜样对他们所依存的社会技术体系产生影响，最终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平衡和文化平衡。此外，通过培养和再生协作能力和公地的生产，日常活动可以在向可持续发展的过渡中发挥政治作用。当然，它们不是一个有机的政治纲领，也将永远无法构成一个纲领——不仅是因为它们地方性的、偶然的出现方式无法被设计，而且因为它们的性质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相距甚远。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论的日常生活政策并不意味着日常行动要服务于政治，它们不是宣传，也不支持任何政党或运动。相反，它们是能够通过其存在而改变事物状态的事件，因为它们是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有形实例，这些行为方式不同于主流方式，并且常常与主流方式相抵触。安德里亚·巴尔佐拉（Andrea Balzola）和保罗·罗莎（Paolo Rosa）在他们的著作《艺术之外的艺术》（*L'arte fuori di sé*）中说：“他们的艺术不是政治性的，但是带着自身的政策性，这意味着它产生了一个改变行为和集体感知度的项目，独立于政治。”（意思是政党的政治，AN）^[2]巴尔佐拉和罗莎说这是关于艺术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想法可以扩展到生活的艺术，即一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单纯的政治意义。最终，日常行动不是政治行为，但每项行动本身可能都是政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世界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看到（和建造）。在地的和日常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舞台；但它们还是开放式的建

[2] 我喜欢从 Paolo Rosa 的这句话开始。保罗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朋友，他过早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有时间教很多人，尤其是教给我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我在本章中将要论述的一切，都来自他提供的合理的框架，我们所做的事情本身具有政治意义。它们甚至可能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含义。A. Balzola, P. Rosa, *L'arte fuori di sé* (Feltrinelli, Milano 2012), p. 176.

筑工地，剧院在此不断地进行改建和调整，有时甚至进行彻底的改造。在这里，我们的主角进入现场。他被安排在特定的时空地点，从这里开始面对生活及生活中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的选择。他在世界上的观察点和行动点都是“在地的”，这意味着其周边环境受其运营方式的影响远大于物理性的影响。他的“在地性”意味着可以从个人或社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因此，在地事物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有局限的，若说有限，也是人类自身的限制，这意味着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所思所为，不可避免地只能从我们自己所处的角度出发。如果传统上我们假设在地是指很小的物理空间，那是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过去的个人和社区无法看到远处，并且类似地，他们只能在附近行动。今天的事情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写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加剧，这种社会关系将遥远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很多在地的事情是由发生在千万里以外的事件影响的，反之亦然”^[3]。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定义的开头，它没有引入特

[3]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p. 64.

定的活动领域，也没有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它仅引入了一个独特的标准，如果存在一个密集、快速、广泛的交互网络，就会存在全球化，这样一处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受到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而不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交互网络如此密集，交互是如此迅速和广泛，以至于我们当地的事物以及我们在这里可以产生的事物，都受到了数千英里之外发生的其他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因此，这种扩展的在地性，这种超局部性的边界取决于我们所隶属的通信网络，这也是我们主角观察世界并对其采取行动的出发点。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角，并在日常情况下考虑他（这是很常见的情况）的所思所为，就像每天早上一样，他在上班途中，被困在车里。此时，他的环境由许多不同的系统决定，自然系统，例如该地区的地形和气候（会捕获车辆的废气，污染周围的空气）；或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城市、城市活动和道路系统的长期人工建造物（因此，他的家离他的办公室很远，他每天必须上下班通勤）。然后是那些短期的人为因素，例如工作时间的组织方式（使每个人都同时上班），交通政策（私家车相对于公共交通工具享有特权），汽车工业（生产了我们主人公驾驶的汽车），通过无线电广播传输的音乐和新闻以及文本、电子

邮件和电话（使他忙碌或分散他注意力）的通信系统，等等。

可以根据它们的性质和结构来思考系统的整体以及各个部分。为此，我们需要想象我们从上往下地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这是专家的观察点。对于车上的人来说，他们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所有这些系统合并在一起，被视为福利；或相反，我认为目前在这种环境下，更可能是不适。

假设（如我所怀疑的那样）不适感盛行，我们可以做出选择，我们的主角可以相信自己适应和接受事物的能力（我们知道人类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但也可能拒绝。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必须运用他的其他能力，他的设计能力，并想出一种行动策略来摆脱自己所处的境地。继续前进，我们的主角很快走上了另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专注于问题并尝试让其他人解决（例如，他可以投票给另一个政党），或者他可以参加环保示威（说服当权者解决），或者再次，他可以尝试自己来解决问题，通过个人行动或与他人合作。

第一和第二条道路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道路，做些事情让别人尝试并找到解决方案。这很重要，而且讨论政治问题也很重要，正因如此，我在这里不打算这样做，因

为它超出了本书的目的。相反，在这里，我将研究第三个可能性，即我们的主角独自或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式。我该如何制定日常生活政策？

从你所在的地方改变世界。日常生活政策一词表示可能会影响我们身处并使我们互相联系的社会技术系统（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的一系列行动，针对于外部世界的、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行动，这些行动从我们所处的位置发起——从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行动角度出发。换句话说，日常生活政策是生活项目的系统性影响。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角，就像每天早晨一样，他在车里，被困在滚滚车流中，慢慢地挪动在上班路上。如果他决定自己做些事情来摆脱这种困境，他实际上会做什么？好吧，有些事情，他可以采取各种策略来做到。例如，当他在车上时，他可以购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来改善生活，无论是放松、社交还是工作。另外，如果存在公共交通系统并且效率很高，他可以选择将汽车留在家中，然后乘公共汽车或火车去上班。又或者，如果年龄和距离允许，他可以买一辆自行车并将其用于日常行动。最后，他可以与其他人达成协议并使用同一辆车（减轻压力和在路上互相陪伴），进而高效地加入或组织拼车系统。还有其他更激进的策略，如果他从事的活动类型合适，他可以自

已在家工作，减少每天去办公室的通勤需求。或者，他可以搬家去办公室附近居住，或者他可以辞去工作并改变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在前四种可能性中停下来，也就是不得不每天通勤去上班时的可能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对应于不同的政策，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而且影响他所交互的系统。

第一个策略使我们的主角无须深度调整即可改善其环境。基本思想是“我必须在汽车上花费很多时间，因此让我们看看如何使这段时间变得更加有用和令人愉快”。这种选择与主导的文化和行为框架最为一致（这是当今最常见的策略，这并非偶然）。我们可以称其为惯性选择，给定一个问题，我们试图通过寻求将其最小化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克服其带来的困难和不适。

第二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策略当然在可行的情况下是最有效的，这也是最简单的。尽管它要求做出重大的行为改变，但离开汽车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一种常见的出路，并且在社会上通常是可以接受的。这种选择的问题在于它的僵化性，如果公共交通工具在那里并且运作良好，那就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公共交通或其效率低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选择。

我刚才简要地概述了四种可能性，表明我们的主人公

本人将如何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环境。在我们的虚构示例中，他能够从原则上都可行的四个不同选项中进行选择，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无论如何，为了保留其理论选择权并付诸实践，我们的主角必须运用他的设计能力，认识到替代方案的可用性，了解其可能性，并在做出选择后将其付诸实践。从这里开始，为了继续讨论日常生活政策，我想谈一谈这四种策略的方式，尽管这些策略受个人选择和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仍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日常选择的系统性影响。通过采取第一个策略——改善汽车的宜人性——人们行使自由选择权慢慢挖出一个相对个人化的福利，接受了社会背景的本质。通过这样做（即认识到城市交通状况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主角未能对运输系统质疑，该运输系统不仅保持不变，而且由于对它所引起的最紧迫问题的敏感性降低，原系统趋于巩固，对于在开着空调的移动休息办公室打电话、聊天和发短信以应对荒谬的交通状况的汽车驾驶员来说，这种方式需要的激励较小。因此，他们会更愿意接受它，因为“无论如何，我不会浪费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复杂系统的智能可以通过其收到的反馈来衡量，反馈信息使其能够确定周围的总体气候（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据此进行自我调整。在这种情况下

下，亲身经历交通压力的汽车驾驶员将是城市系统中最好的传感器，用以记录其交通系统的不足之处。因此，汽车中的空调、音乐和网络会降低驾驶员的敏感度，并降低他们的反馈意向。实际上，这使整个系统更加“愚蠢”。同时，这种选择为电子和汽车工业提供了指示和刺激，促使他们寻找更好地满足“移动舒适性”需求的解决方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拥堵使得移动性是相对的）。结果是电子和电信行业以及汽车行业朝这个方向发展，巩固了不可持续的发展轨迹。

从所有角度来看，一个联网的人，独自关在车里，堵在路上，是不计其数的人们日常生活荒谬性的象征，这种荒谬性远远排在了环境和社会不可持续性之前。

相比之下，在可行的情况下选择公共汽车或火车出行，对于那些有能力在较广泛的系统层次上做决定的人而言，也清晰地表明了公共交通系统重要性，因此，在必要时应予以支持和改进。此外，改善公共交通需要大规模的系统设计，因此，我们的主角可以做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不使用现有系统）是以传统方式在政治层面上采取行动（通过投票或参加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运动），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旨在指导交通系统未来发展的协同设计，并充分利用他作为用户所学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使用自行车或拼车这另外两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在很多地方，这两种选择被认为是局部不连续性的（请参阅第1章）。尽管方式不同，但两种方式都对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方程式提出了疑问，即个人机动性=私人汽车。这种在个人或小组层次上连续性的中断，以及其他类似的非连续性，可能会鼓励负责交通和城市规划的机构创建新的自行车道，为拼车者保留车道和停车位；或像某些城市已经开始发生的那样，促使他们重新定义整个交通系统，从总体上促进自行车的使用和替代性出行，从而在城市一级造成系统变化（第1章）。

简而言之，这些在地选择及其所造成的局部不连续性具有双重影响，对于接受这些选择的人来说，它们是眼前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它们也可能会影响到大规模应用的社会技术体系，其发展方向与当前的主导方式截然不同。显然，这种大规模的影响只是一种可能。如果我们的主角是唯一选择骑自行车的人，那么他将来仍会发现只有自己踩单车。同样，如果拼车方案仍是少数人的选择，并且没有指定优先车道，那么他的共享车仍将被其他人堵在车流中。尽管如此，做出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我们的主角能够将他日常生活中可能影响系统的可能性付诸实践。使某件不仅对他自己有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意义的事情发

生。因此，无论他是否有意识，一旦采取行动，他在整个社会的未来中都扮演着设计和政治的角色。

在上一章中，关于这种处理方式，我谈到了自治。现在应该补充一点，这种自治是建立在能够改变世界的日常政策的基础上的。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日常生活和生活中的选择也可以用与迄今为止提出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

越界

我们可以摆脱控制设备吗？到目前为止概述的场景表明，人们有可能跳出系统，反抗主流的做事方式，并且有意无意地在日常生活中采取政治立场，表现出高度的自治权。显然，还有另一种观察视角，在继续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从与我相反的另一角度来看，社会成为不可避免的控制系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据说这种控制是由各种组织执行的，包括家庭、工厂、学校、军营、医院、疗养院或监狱^[4]。毫无疑问，如今这种控制方式还包括通过数字媒体、数字媒体所基于的算法以及可以执行

[4] Michel Foucault, *Sorvegliare e punire: la nascita della prigione traduzione di Alcesti Tarchetti* (Torino: Einaudi 1976); Michel Foucault, *Microfisica del potere* (Torino: Einaudi, 1977).

的数据处理^[5]进行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对于那些以这种方式思考的人，所有的抵抗策略和我在上一段中指出的策略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逃脱系统的控制。

实际上，这种构想、它所依据的分析以及所产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当前的现实以及更强大的系统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但是，在我看来，它并不包含整个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能降低为一个逻辑。相反，可以用各种模型来描述它，每种模型或多或少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某些方面。但是，像所有模型一样，这也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现实包含了它向我们展示的内容，但还有很多。

如果我们不认为此限制是每个描述所固有的，那么出现的现实就是一个单一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是一个由无所不知、无懈可击的设备所控制的社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识到复杂性，那么我们会看到基于各种逻辑和设备的现实，这些现实可能非常强大，但并非无所不知且永不出错。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多重可能现实和控制机构

[5] Byung-Chul Han, *L'espulsione dell'Altro* (Milano: Nottetempo, 2017), p. 25. Vedi anche *Psychopolitik: Neoliberalismus und die neuen Machttechniken* (Fischer, Frankfurt 2014)—trad. Federica Buongiorno, *Psicopolitica* (Milano: Nottetempo, 2016).

的缺陷中，我所谈论的局部不连续性也将与之伴生，这意味着人类有可能利用其创造力和能力来使用资源，用超出预期的方式来做事。最终，受控社会的场景可能有助于认识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中的陷阱，并将其考虑在内。但是，这不应阻止我们看到现实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场景，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提供机会。

第二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我个人的视角，与迈克尔·塞托多（Michel Certeau）在1980年代阐述的推理思路并行，可以在今天再次加以讨论，他的理论可以根据当下的社会和技术创新进行更新，当然，可以根据更泛泛世界景象进行更新。

越界策略和战略。30多年前，德·塞托多（De Certeau）^[6]在他的《日常实践》一书中强调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模型的抵制行为的频率，以及他们将被强加之物进行诠释和适应自己用途方面的创造力。从这里开始，他继续介绍“生产性消费”的概念，一种使消费者成为新意义的生产者的活动。换句话说，消费者的策略使其成为能够发明日常生活的演员，这种策略使他能够对提供给他的商品系统进行原创和意想不到的使用。在我看来，这些观察仍然完

[6] 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全有效，但是需要更新。

在德·塞托多专注于活跃消费者的形象之后，这一概念立即在营销中得到了充分认可，并因此尝试将其纳入公司战略。此举的结果需要讨论，只不过对现在而言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同时，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各种方式参与内容生产的人数成倍增长，有效地成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内容的生产者已取代了活跃的消费者，从而产生了所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同时，社会创新使新一代的社会参与者得以公开，他们能够通过行动发明日常生活，其结果不是对现有事物进行战术调整，而是在局部范围内进行系统变革，骑自行车放弃汽车，远离大规模分销渠道，同时与生产者建立直接关系，通过引入合作生活元素改变公寓的生活，等等。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思考和做事的方式，需要对30年前德·塞托多提出的一些观察和概念进行更新。他提出的共创者的形象是一个本质上孤立的对象，他可能是活跃的和反馈性的，但仍被关在生产和消费系统中，他只能修改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社会创新提出的是一个跳出笼子，重新定义问题，以不同的意义框架使用存在的事物并启用全新生活方式的人。实际上，对于德·塞托多来说，共创者能够提出的日常发明都是战术性的。他们关注的是

单个参与者在给定背景下行动的能力，抓住了局部修改的机会，而没有真正质疑它们发生的系统以及它们所基于的权力关系。反之亦然，制度变革，德·塞托多称其为战略变革，是因为这涉及制度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变，对他来说，是体制干预的领域，或者是拥有权力的机构的干预领域。

在我看来，社会创新打破了这一常规。其中的行动者所做的不是战术选择，就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都是战略选择。诚然，这是在局部范围内发生的，但是，它们仍然能够产生大规模的系统变更。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规模的根本性变化会产生乘法式的交互作用和合并，从而使这种重大变化得以准备并成为可能。

我现在想补充一点，这两种情况都属于战略选择，即特别积极的人们发明并将（局部）全新的举措付诸实施（例如使蒙特瓦尔基的第一个农夫市集焕发生机的农民群体），以及该计划的成功使它得以稳定和制度化，从而（在局部）成为正常状态，这种常态性仍具有变革性，因为它抵消了大规模主导系统的定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将简要介绍构成日常生活政策基础的变革性社会创新（第1章），并介绍创新轨迹的概念。

从行动主义到变革常态。本章开始的蒙特瓦尔基农

夫市集的实现路径就是创新轨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每次社会创新都始于一群人，一个创意社区^[7]，他们发明并实践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做事方式。然后，如果这个想法是一个好主意，它可能会从最初的英雄阶段演变为一种成熟的形式，使更广泛、更少投入的公众可以接触到。这种进化可能以各种方式发生，导致不同的结果，具体取决于它们发生的背景以及其倡导者的意图和设计能力。为了讨论这一点，我们来看另一个案例，上一章中介绍的集合住宅项目，它从英雄般的住宅计划转变为成熟的协作住房形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我们将看到的。

上个世纪下半叶最初的集合住宅是由于人们的集体行动而产生的，不管在协作住房的实际价值方面，还是在其潜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方面，这些发起人都具有高度的积极性。正是这两种动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发明新的生活模式，并面对各种困难将其付诸实践。在做的过程中，他

[7] Anna. Meroni, *Creative communities. People inventing sustainable ways of living* (Polidesign: Milano, 2007); Meroni, A. and Selloni, D. (forthcoming 2018)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ors*. In: Walker S., Cassidy T., Evans M., Twigger Holroyd A. and Jung J. (edited by), *Design Roots* (Bloomsbury Academic. ISBN:9781474241816).

他们还启动了意义深远的创新过程，通过使协作住房的优势清晰可见，他们增加了潜在的关注人数。反过来，这也促使人们寻找更容易采用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花费较少时间和精力进行这项活动的人们来说，这些解决方案更加可行。同时，政治决策者和建筑公司开始认识到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价值，以及它们与人们实际需求的对应关系，并创造了更合适的财务和监管环境，使之成为可能。简而言之，初始观念逐渐演变为可及性更高，产生了一种变革性的常态^[8]，协作生活方式已成为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们的正常生活，尽管与大多数其他住宅形式中的生活方式仍截然不同。

意大利社会住宅基金会^[9]在欧洲多个城市进行的最新研究强调了住宅以及人们在城市中的居住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基于空间和服务的灵活共享的生活方式仅由活

[8] 变革性常态的一个正式定义可以是，在给定的上下文中（即，对于接受它们的人来说是正常的）变得常规的思考和处事方式，但在其他情况下却与常规做法相去甚远。因此，变革性常态是局部不连续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变革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技术系统中的主流实践。

[9] 这项研究也是“新都市体：都市新生”的内容材料，这个展览由 Giuliana Ferri 策划。展览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米兰三年展举行。

跃的少数群体创建和使用，现在则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他们认识到这与我们所处的流动世界更加一致。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居住和工作类型，“住房类型很多，并且在不断演变，它们的形状和形式模糊了住宅、办公室或服务区之间的界限……今天，我们可以租用办公室的桌子、特定时间的房间、一起吃饭的集体厨房，以及所有在物理和关系环境中可以扩展和完善我们体验的事物^[10]”。

这里描述的现象比我们到目前为止对创新轨迹所说的要多。它告诉我们，这可能导致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不仅可以保持其社会品质，而且可以相互交织在一起，以产生新的社区和新的城市有机体（正如我们正在谈论的研究结果中所述的），将住宅、服务、生产和文化活动相结合的多层次实体，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复杂的混合空间，由于其复杂性，可以成为城市更新的中心，

[10] 米兰三年展展览“新都市体：都市新生”的介绍：<http://www.newurbanbody.it/la-mostra>。这些新的城市有机体不仅具有多种功能（生活、工作、社会交往和娱乐）的融合，而且其特征还包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多样性、全天候的空间使用、多个角色（公共、私人、地方组织和普通公民）的推广和管理、各种使用方式（免费、消费、合同制）、各种使用时间（按小时、天、月或年）各个层次（本地和全球，物理和虚拟）的运营，以及它们对财务、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定位。

并有助于重建城市的社会结构。

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上所述。最初的思想与实践也可能随着其他轨迹的发展而成熟；它们可能会逐渐失去或完全背叛产生它们的动机以及最初想法所产生的社会价值。仍然以生活为主题，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我们提到的积极案例之外，其他方面则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完全商业的眼光看待共享服务的案例，以安全或地位为名，将人们隔离在受保护的、被围起来的住宅区内。通过这样做，他们开始了与协作生活的最初想法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

转变

创新轨迹和设计选择。总而言之，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最初构想正在演变和转变。就其社会意义而言，它们可以保持某些原始特征这一事实只是可能性之一，而不是理所当然的轨迹。相反，如果不进行持续的、慎重的重新设计和逐步的重新定位，创新轨迹很可能会采用当今看来最简单的方向，以生产效率的名义，废除或否定最初的社会价值。这样的结果是，与其为生活项目提供朝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可能空间，不如将其吸引到新的方向（以及朝着日常生活政策的方向），这些方向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不是真的负面的话）。先前提到的受保护社区是一

个案例，但是不幸的是，还有许多其他案例。

为了辩论这个问题，我将提及另一个活动领域，以另一个著名案例为例，同一路线的人们共享汽车，这就是拼车。最初的想法是既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又可以进行社交和减少交通流量。利用数字技术和地理定位技术带来的可能性，这个简单但可能非常有效的想法已朝各个方向发展。出现了数字平台，它以各种方式支持彼此认识或可能认识的人们之间的相遇和汽车共享，他们每天都走相同的路线（从而使自发性的汽车共享更加高效，这种自发的汽车共享一直存在，那些拼车者往往住在同一社区，并在城市的另一个地区工作或学习）。尽管这种路径与原始创意保持了更多连续性，但更为成功的发展模式最终抵消了原始创意所基于的所有社会和环境价值。剩下的就是使潜在的驾驶员和乘客保持联系的基本功能，即通过专门设计的数字平台以简单而廉价的方式进行联系。该领域的世界冠军显然是加利福尼亚的优步（今天其垄断地位受到中国的滴滴^[11]的威胁）。

[11] 优步（Uber）和滴滴出行是通过直接将乘客和驾驶员连接起来的应用程序提供私家车运输服务的公司。优步的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并已遍布全球。滴滴出行在中国拥有垄断地位，在中国收购了优步中国，并且目前正在向其他国家扩张。

从生活项目的角度看这些例子，由一群朋友或邻居发起的拼车实践，其最初想法与优步这样的全球平台之间相距甚远。在最初的拼车思想中，车上的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位置，即使在特定时刻只有一个人在开车并将他的车提供给别人。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看，这都是一项协作活动，在此活动中，各个人的生活计划会以同等的尊严和同等的权力相遇并交织在一起（非正式的良好行为准则要求第一位乘客坐在驾驶员旁边，仿佛在说，“我们都是同伴”）。相反，成为大型平台之后，驾驶员、乘客和平台管理员之间的角色和地位存在明显差异。平台管理员拥有所有权力。乘客使用者成为普通客户，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提供给他们的服务可能非常高效且便宜，但没有任何关系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乘客坐在后座上，意味着角色的不同）。最后，有一个司机使用者最终成为临时工作人员，没有工作保障和权利，完全依赖于平台所有者。

我们可以对移动平台的案例进行总结。在其他领域也采用了相同的模型，例如，住房共享、物品配送、工作供求。在实践中，它已经迅速扩展到所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去中介化、使用者地理定位以及数字支付等手段结合在一起，给用户提供了有效的服务，为平台所有者带来了利润。这些就是我们讨论的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与新合作运动。正如今天所展示的，出于各种原因，平台经济存在很大问题。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将适当的调节抗体引入网络，那么赢家通吃的原则将永远占上风。因此，此类平台正迅速成为全球垄断者。让我们来仔细看看。

赢者通吃的原则是网络的不正常属性，通过网络，只要实现更高效率，就能够轻松地主导全球市场。这是不正当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会产生怪物，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垄断，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看起来不像人类。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些全球化的私有数字平台的第二个大问题已经迅速出现，以工作和经济生存为基础的人们完全依赖于它们，因为工作机会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平台所有者。这使他们的生活极度不稳定，平台经济中的新员工是数字劳工，他们随时随地按要求向任何有需求的人提供微服务，而这些服务并没有持续性或对未来的保证。

面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平台经济带来的这个巨大问

题，出现了批评和替代提案方案的原创运动^[12]。

其基本思想是，平台产生的社会灾难以及它们作为工具的非中介性，不是由平台本身引起的，而是由拥有平台的组织造成的。问题是这些组织在应用平台的活动领域内垄断，而基于这些平台工作的人们缺乏权利。因此，需要做的是想象并创建属于使用者的本地但相互联系的平台。因此，提出了合作社这一旧观念的新版本，并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平台建立新的合作社。反之亦然，即创建用户可以拥有的平台。

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观点，它指示了一个方向，该方向将改善那些依靠它们的人的工作条件，从而在其管理中引入民主和公平原则。但是，为了恢复最初想法的协作特

[12] 在过去几年中有关共享经济的争论中，有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从最初的口号“共享即拥有”转向另一种说法“拥有是新共享”，其中的支持平台是由使用它们的人所拥有的本地平台。Scholz, Trebor (December 5, 2014). "Platform Cooperativism vs. the Sharing Economy". *Medium*.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6; Scholz, Trebor. *Ov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City: Polity); Schneider, Nathan (December 21, 2014). "Owning is the New Sharing". *Shareable*. Retrieved 10 December 2016; Fuster Morell, Mayo (September 2012). "Horizontes del procomún digital" (PDF). Retrieved April 25, 2017.

性，并将平台重新带入协作项目的范围，我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认为，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工人所有权的问题，因为这当然是最基本的问题，而且需要考虑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产生的关系价值和共享的社会公地。换句话说，我认为对当前平台经济的批评应该将平台本身的所有权问题与所建立的关系的质量问题相结合，或者可以通过使用平台来建立关系的质量。

共享经济和协作经济。有关平台、其运行方式和它们创造的新经济的辩论，在近年来因社会和技术创新而引起的现象的更广泛辩论中并存在一起，这种现象导致了许多创新经济模型的兴起，通常被称为共享经济。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许多共享经济模式以及整个共享经济而言，很明显它们的创新性没有相应的社会价值。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平台经济（这是共享经济的一种形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已经对该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13]。我只想观察一下，如果共享经济在其许多应用中迅速丧失了其社会特性，那是由于这些协作实践在其中演化或退化的方式造成的。产生适合于协作的关系价值会花费时间和精力（请参阅第2章），因此协作维度已逐渐减少为零（如我们在移动平台中所见）。这种情况往往以客户服务效率的名义发生，最重要的是，这是应投资者要求最大化平台本身的盈利能力的要求。

鉴于已发生的事情，我认为需要更新术语，共享经济仅仅意味着汇集一类事物，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关系方面有任何特别做法。另一方面，当关系维度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时，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协作经济来表现，一种不仅共享工具的经济（即共享经济），而且人们也共享了目标。更确切地说，“协作经济被定义为基于横向网络和社区参与

[13] 共享经济是一个广义的术语，近年来涵盖了一系列不同的含义。Sundararajan, Arun 2016 *The Sharing Econom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Rachel Botsman, Roo Rogers, 2010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Tiziano Bonini and Guido Smorto 2017 (eds.), *Sharable! L'economia della condivisione* (Roma: Edizioni di Comunità).

的实践和商业模型”^[14]。它的重点是“个人财产的共有所有权，服务的共同管理，物品的共同生产，因此，更多地取决于协作而不是共享”^[15]。该定义的第二部分很重要，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其表达的内容，即协作经济的重要构成要素；二是就其参与者而言。引用的句子实际上是托斯卡纳大区政府发表的协作托斯卡纳绿皮书（*Libro Verde Collabora Toscana*）序言的节选：这来自托斯卡纳的实地研究结果。如副标题所述，该文档旨在成为“合作经济和公地的区域议程”。该文件及其之前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了协作经济的思想 and 实践是如何传播，如何在体制层面受到关注的。

[14] Ouishare, http://ouishare.net/en/about/collaborative_economy.

[15] Vittorio Bugli, Assessore alla Presidenza della Regione Toscana, Preface to *Libro Verde Collabora Toscana. Per un'agenda regionale sull'economia collaborativa e i beni comuni* (Firenze: Regione Toscana, 2017). Scientific management LabGov. Gener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ocioLab. 绿皮书不仅为协作经济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最新框架，还针对该主题提供了建议，并概述了在托斯卡纳进行的“托斯卡纳合作经济试验计划”（*Piano di sperimentazione sull'economia collaborative in Toscana*），其中确定了12个主要目标，这些目标对应于许多活动领域，包括交通、住宅、农业和酒店业。

就我而言，我认为这种关注和应遵循的制度试验是当今协作经济所需要的。这是一个试验治理形式的问题，该治理形式将自下而上的协作实践（作为积极公民身份的表达）与其他相关的或可能参与的社会角色（例如，第三部门、公司、大学）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部门的作用微妙而又至关重要，为了使协作经济实践充分发挥其创新潜力，而又不走向社会不可持续的方向，它们需要伴随适当的治理形式。但是，由于尚不存在此类形式，因此它们必须成为体制实验的对象^[16]。

协作、效率和关系价值。可以从各种角度讨论和支持协作经济。与本书主题最相符的角度侧重讨论协作本身，尤其是相关人员之间的协作交流，然后针对一个个体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我会选择协作？选择不协作？”古典经济学家过去常常从做出“理性”选择的主体角度回答这种问题。对于质疑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意味着“根据他个人的经济利益”。随之而来的是，这个“经济人”将永远不会花时间去做一些没有取得个人利益回报的事情。但是，这个完全的经济人不存在。

总体上讲，特别是最近的社会创新历史向我们展示了

[16] 我相信这也是 Assessore Bugli 为绿皮书所作序言最后部分的含义。Vittorio Bugli, *ibid.*

人们以其他方式做出决策，（也）使用其他形式的理性，并（也）表达了其他利益。因此，今天，创新经济学家的答案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在做选择时，认为他本人、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是一个整体^[17]。

但是，我认为参照对象的这种变化很重要，但还不足以回答我最初提出的问题，即我们的主角为什么应该选择合作的问题。它告诉我们人们可以（也）选择合作，但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何时、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合作（而不是在什么条件下不合作）。为了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必须做出选择的人的位置上，仔细观察他的动机，他面临的困难以及他真正认识到的结果。这样做，我们将领会到，协作式相遇产生的关系价值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并且会感知到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为建

[17] 对于公法学教授、公地研究专家克里斯蒂安·伊艾奥尼（Christian Iaione）而言，从市场经济向协作经济的转变对应于主角从“经济人”向“多重活动”转变，这一观点参考了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的思想：通过在公共场所行动并出于共同利益与他人协作来使自己的生活会意义的人。Gregorio Arena, Christian Iaione, *L'età della condivisione. La collaborazione tra cittadini e amministrazione per i beni comuni* (Carrocci Editore: Roma, 2015) pp. 14, 15;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立关系总是需要一定的承诺)。我已经在第2章中提到了这一点,但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们的主角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必须考虑两种选择,是否寻求最大的效率和可及性(从他自己的角度看,谁将从提议的解决方案的结果中受益),或者接受利益减少,并将其部分资源用于产生关系价值和社会公地。显然,没有公式可以让我们一劳永逸地知道该如何做出选择,即在给定的可能性范围内,每个人在效率和关系价值之间寻求适当平衡的方式,这种平衡只能视情况而定。

现在,我们将更改观察点,并考虑做出选择时所依托的生态系统的特征。最好的情况是为我们的主角提供各种可能性(就效率和产生的关系价值的组合而言),使他可以选择对他更合适的事物,从而使他有可能从可获得的解决方案中可获得性与关系价值的不同组合中进行选择,这些不同组合存在不同的平衡。迄今为止,成熟的社会创新案例——农夫市集、集合住宅、合作社和关系平台——只是这种可行折衷方案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找到以均衡为特征的其他可能案例。

话虽如此,但肯定不应该发生的是使两极之一无效。如果我们试图保持关系价值的产生,而又不提高方案的可获得性和效率,那么方案将趋于自我封闭,这意味着将仅

限于发起提案的一小群高度投入的人们。这样，当他们的精力衰竭时，它将不可避免地消失（不可能永远成为社会英雄！）。反之亦然，仅寻求效率和可获得性会导致提案的协作性丧失，从而使其变成一项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创新和成功的项目，但却没有社会价值。

当社会创新轨迹达到标准化阶段时仍保持其变革性特征，这意味着它将这种趋极性转变为一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张力，能够产生无限数量的解决方案，每个解决方案的特征是两极之间的不同平衡，因此可以带来不同形式的协作。

总结这一部分，我想回到结束第1章时对轻盈的赞美。然后，我谈到了当代社区的轻盈及其所代表的开放、灵活的互动的价值。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18]中谈到轻盈时所写的那样，它们可以基于对“分秒、移动和轻盈的深刻理解”来构建。

在这里，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协作及其导致的日常生活政策，我可以说同样的话。我将更好地说明自己，尽管始终存在基于强大、热情、好战（英勇）协作的行动，但只有在存在可获得性、多样化和轻松协作的情况下，才会

[18] Italo Calvino, *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 and 9 (English version).

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细微场景。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扩大和增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变革性常态的岛屿，并使之可供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以便他们有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样，他们将能够在日常生活政策方面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日常生活政策、其他政策和其他民主。在上一章的最后，我写道，这些日常生活政策是使世界摆脱其依循的灾难性轨迹的前提条件，但单凭它们本身还远远不够。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需要专家和公共机构的贡献，以便为它们以出现和发展的最佳方式创造有利的环境。

需要社会活动家来扩大可能性领域，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专家、体制和企业需要努力提高其可获得性，从而创造和巩固变革常态的新领域。我们需要创建设计行动和活动网格，这些行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规模上运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民主的一种新形式，或更确切地说，可以看作参与性民主的一种新分支，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日常生活政策在其中发挥作用。在人们和社区的生活项目中发出声音，同时拥抱和巩固他们的变革能力。

4. 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思想和项目生态系统

离我住处最近的村庄安布拉（Ambra）的中央广场上，总是有人在酒吧里，人们总是在讨论。我们谈论自己、别人、世界。我们讨论足球，显然，也讨论政治，尽管比以前少了。广场也是各种社交网络相互交织的地方，村庄中发生的一切都会经过这里。

安布拉（Ambra）广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与传统上意大利的其他许多广场没有差别。它与众不同的方式是，这样的地方变得越来越稀有。显然，安布拉并不属于世界之外，因此，正如老年人所说，这已不再是过去，在这里，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倾向也在起作用。但是，在这里，在过去的社区和可能产生的未来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安布拉的酒吧和广场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里聚会的人也参加了与其工作、兴趣、年龄和来源（原住民、选择来此的居民、来自各个民族的移民和游客）相关的各种社区。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生活和自主领域，但是在安布拉，他们也设法互相见面并建立了一个“属于这个地方”的人的社区。这是一

个与过去有联系的社区，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它是一个开放、灵活、现代的社区，与地方息息相关。它是一个具有可渗透性且可更改边界的地方社区。

我已经写过关于这些社区的形式，它们的存在方式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交织项目的附带影响。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广场也是理解民主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在谈论什么民主？

在安布拉（Ambra），我们显然投票了（尽管热情有所减弱）。但是，在这里也很清楚，民主不仅仅是投票。民主也是讨论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小村庄，安布拉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有 Filarmonica（那里经营着影剧院、乐队、为学校开设的音乐和演唱课程）；Proloco（意大利的一个旨在促进和发展场所的地方志愿者协会）组织了许多娱乐活动；Misericordia（意大利的一个自愿的联谊会，为病人和老人提供救护车服务和援助）和体育协会。安布拉还与附近的村庄共享许多其他协会，这些协会涉及年轻人，艺术、旅游、农业和环境，还有教区教堂和政党。

虽说在安布拉有许多商讨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个协会都有一批积极

分子，其他人则以各种形式加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即使这样它们也不能完全代表所有人。因此，它们不能被视为代议制民主的表达。尽管如此，这些丰富的协会不仅在各种问题上产生了切实的成果，而且确实有助于民主。通过引发对话，它产生了构成民主前提的共同点，语言和话语，倾听和比较想法的能力。他们通过项目和想法，为民主讨论提供了正式的代表性维度，并使之与这种活动网所提出的内容保持不断对话，我将其称为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即使不再有过去的宏大叙事，但仍然存在着民主的共同愿景，即在将前面列出的所有倡议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时所给予的意义。因此，尽管确实，我们以传统方式公开开会的次数较少（以讨论其他人在市政厅、大区政府或国家级别已经或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仍在广泛讨论我们打算做什么，关于原则上可以由我们自己实现的想法。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民主模式，其中正式民主形式与参与性和项目导向的民主形式互相交织，相互影响并形成良性循环。

普及化

民主的复杂性。民主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词，它的词源使我们回到人民政府的含义 [从古希腊语demos（人

民)和krátos(权力)]，在其原始意义上，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政府体制，由“人民”，即公民，直接或间接行使权力。对第一个定义的实际翻译引出了两个其他术语来描述人民如何行使其政府权力。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平等”，其中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寻求幸福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是人权问题，如今它已与民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我们追求平等，这带来了公平分配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问题。但是，平等也意味着承认个人自由有其局限性。它必须接受他人自由所赋予的限制，其中还包括公平分配必需的资源和服务。

自由和平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自由主义传统，它肯定了规则、分权和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强调资源和权力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传统，即平等。

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是互有反作用的，一种增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另一种减少，反之亦然。但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一定是民主的问题。正如政治分析家尚塔尔·穆菲(Chantal Mouffe)所写，这种张力“创造了一种空间，通过对抗保持开放，权力关系始终受到质疑，

没有任何终极胜利”^{〔1〕}。

对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来说，民主是最能促进个人能量发展的社会环境。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处于长期不稳定的状态，需要持续的适应和重读现实的能力^{〔2〕}。因此，民主可以描述为一个可以进行对话和决议的空间，可以接受一套规则，每个人都有或应该有同样的表达和影响结果的可能性。达到这些规则的方式可能非常不同。为此，需要具备一套能力和价值，这对于杜威而言，是教育、对公益的兴趣、批判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和分享的意愿。另一方面，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这些能力和价值观在社会中的传播是社会共同利益的一部分。社会共同利益的一部分对民主至关重要，最后，我们可以说民主本身以及促成民主的所有能力和价值观，是一种共

〔1〕 Chantal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2000), p. 15.

〔2〕 John Dewey, Emerson—The Philosopher of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13, 405–413, July 1903.

同善^[3]。

这种观察带来了其他同样重要的观点。如果民主就是这样，那么它就同所有共同物一样，其适用的规则不能像其他产品一样被设计和生产，不能被强加或删除，它只能随着整个社区的发展而出现（第1章）。从这里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的观察结果，民主与所有公地一样，不能完全实现。它只能通过使其生成的社会民主化的过程来实现，就像通过公共化过程来建立公地一样。为了促进民主，我们需要将注意力从名词转移到动词上。从民主这一抽象名词，转移到民主化的具体过程。经历了这些过程，任何

[3] 本章的背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Carlo Donolo，尤其是他的 *Il sogno del buon governo, Apologia del regime democratico* (Milano: Anabasi, 1992) 一书（《好政府之梦：民主政体的道歉》）。当我 25 年前读到它时，它为我了解民主与复杂性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当现在再次阅读时，在我看来多诺洛在那本书中所说的一切仍然非常适用于当前情况。鉴于民主危机日益严重，我最近又回到了这个话题，这也要归功于维克多·马戈林 (Victor Margolin) 在 2012 年卡内基·梅隆大学演讲后我与他的对话。Victor Margolin, *Design and Democracy in a Troubled World*, lecture at School of Desig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pril 11, 2012 (<http://www.democracy-design.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Design-and-Democracy-in-a-Troubled-World-.pdf>).

社会都可能走向民主（或者，在目前看来，在世界许多地方可能在从先前达到的民主水平退步，这个退步过程激活了民主化进程）。因此，从原则上讲，任何社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特定路径进行民主化，并从其特定的出发点和由此而来的机遇中进行民主化（并相应更多地促进了某些问题）。

有学习能力的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民主是建立共识和达成共识的领域，都是耗时的过程。它也是冲突和调停的地方，因此也是浪费时间的地方，如果仅从技术官僚效率的角度来看待时间的话。

如今，在许多人看来，民主的这种内在黏滞性与我们必须和将要处理的问题的紧迫性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迫切需要作出强有力、迅速的决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以效率的名义支持威权主义，准备牺牲自由、平等和力量均等的基本原则作为代价。

这些提议及其看待事物的方式必须被抵消，这不仅是因为出于道德原因和原则上的考虑，还因为它们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理论和过去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民主是唯一能够在艰难的过渡阶段维持人性的政体，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我们面临着所有风险和困难。例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对环境极限的认识，对核能的批评以及对有机农业和本地

食品的认识都属于少数派。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但在民主政权的范围内仍有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少数群体，而当时这些民主政体的主流思想是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在专制政权中，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以有效实现当时看来是优先事项的目标为名，阻止了其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后来被证明对解决问题有用甚至是必要的思想，这些思想能够应对突发事件和在当时背景中不可预见的变化。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因为接受并培养了多样性，民主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提出替代方案。换句话说，民主是一个有弹性的政权（第1章）。

同时，由于民主本质上是开放和宽容的，民主可以解放创造力、技能，并最终解放人类所拥有的项目制作能力。此外，它还可以增强他们的另一项能力：权衡他们的经验，以及在面对证据和/或令人信服的论点时，改变他们的想法，或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从而创造知识的能力。因此，民主不仅是社交对话的中立工具，而且还是一种能够学习的制度。换句话说，它能够将个人和小组的经验转化为整个社区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因此，公地构成了新的活动、协作项目和民主实践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

因此，尽管不可否认，迫切需要改变事物的状态及其发展方向，但这样做的方法不是独裁政权的残酷方式，也

不是技术官僚主义的效率主义式的对速度的狂热追求。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给民主时间，使其尽可能地加快发展，并给它提供生产或复制作为其基础的共同利益的可能性，这同时也是我们所有人学习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小星球上生活得更好的可能性。

危机的维度。今天，民主处于危机之中，民主威权政权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成功正是这危机的证明，更令人惊讶的是，欧洲和美国正在进行的道德文化变迁（围绕移民问题正在发生讨论的是最明显的方面）更是活生生的证明。但是，这些现象虽然很引人注目，但似乎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中。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并处于危机中的民主的规则、价值观和制度是过去产生的。它们经历了西方社会走过的长达数世纪的现代化道路，从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背景和价值观中诞生。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迄今所知的全球化已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边缘化，刺穿了构成民主基础的社会协定。此外，通过强行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令大家别无选择，这种全球化要求遵循其指令而没有自由余地，几乎就像是自然法则一样。因此，它废除了民主定义中的第一个基本支柱，民主即人民力量。如今，我们每天都看到被各种级别的机构所代表的人们，决定是否

做事和如何做事的权力越来越少。据说，这是因为没有任何经济上可行的选择，唯一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继续当前的模式。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在朝着超集权制发展的过程中，决策越来越不透明，缺乏民主推动力的体制和经济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地做出决策。结果，人们的印象是民主讨论是无用的，因为最终其他地方的其他人做出了决定。在我看来，这是民主危机发展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那么讨论和审议就毫无意义。如果以经济体系自主性的名义（实际上只是特权精英厚颜无耻地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行动领域减少到很少甚至没有，那么就不可能有民主。因此，我认为，民主的复兴必须从这里开始，从根本上肯定民主必须赋予人民以更多的“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以创新的方式将自由与平等、人权与社会公正结合在一起。这意味着通过推动一个伟大的试验阶段来应对民主危机，充分利用社会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机会进行民主试验。

实验

走向分布式民主。如果人们必须拥有权力，那么就必须存在可以真正做出决定的问题以及可以做出决定的领

域。实际上，这意味着必须将有关各种问题的决策权赋予相关社区。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要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本身必须具有地方维度，对此做出的选择可以对局部产生直接影响。

换句话说，不仅是在本地讨论问题，然后由中央层面决定并付诸行动。相反，需要开发生产和服务系统，其本地功能主要取决于本地子系统，具有自治权，并由本地做出和执行决定。这意味着从当今流行的集中式分级系统转变为分布式系统，由相互联系但相对自治的元素组成的网络的社会技术系统，当地社区可以根据这些系统真正地做出决定。

罗宾·默里（Robin Murray）描述了这种过渡（对他而言是范式的转变）：

“向网络化范式的转变有可能改变组织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它的分布式系统不是通过中心的标准化和简化来处理复杂性，而是将复杂性分布到边际，家庭和服务使用者，以及工作场所中的本地管理人员和工人。处于边缘的人具有中心的人所无法获得的优势——对细节的了解，这些细节包括时间、地点、特定事件的特殊性，以

及在消费者和公民的身份之下，需求和欲望的特殊性。这就是潜力。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与用户互动的新的方式、新的工作关系、新的雇用条款和薪酬。”^[4]

就我自己而言，在其他场合^[5]，我已经充分讨论了这种新范式及其衍生的场景（我将其称为SLOC场景，其中SLOC代表小型、开放、本地、连接），技术系统能够解决复杂性，因为正如默里所写，它们将复杂性重新分配到网络节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可用资源并通过经验学习。正是因为如此，分布式系统才具有弹性和可持续性（与本质上脆弱且不可持续的集中式、分层系统相反）。除了这些有利因素之外，我现在还可以说分布式系统也是民主的有利环境，通过将活动和权力分配给网

[4] Robin Murray, "Dangers and Opportunity: Crisis and the New Social Economy," NESTA—Provocations, September 2009 (<http://www.nesta.org.uk/publications/reports/>).

[5] Ezio Manzini,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See also: Ezio Manzini, "Small, Local, Open and Connected: Design Research Topics in the Age of Networks and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Design Strategies* 4, no. 1 (Spring 2010).

络节点，它们使讨论公共利益问题成为可能。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一些问题，以便使直接利益相关的社区可以参与辩论。

想象从（通常）集中化的系统到（通常）分布式系统的过渡并不是乌托邦。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现实及其所有矛盾之处，就会发现，尽管集中式系统模型仍然占主导地位，但也存在对立趋势，连接性和众多设备的小型化使得采用分布式组织形式和系统变得越来越便宜和方便。最明显的例子是可再生能源，其本质上非常倾向于分布式系统。另一个是食物网络，本地生产和消费系统正在扩散。最后，随着创客运动和新的数字工匠的出现，我们还目睹了制造业方面的分布式系统潜力的试验^[6]。在此讨论中，我们还可以添加另一个关于分布式经济前景的讨论。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引入诸如经济民主、新的合作主义和公地复兴等问题。

毫无疑问，目前，这种范式的改变只是一个机会，并

[6] S Maffei, *Microproduction Everywhere: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Emerging New Distributed Microproduction Socio-Technical Paradigm*, in *Social Frontiers: The Next Edge of Social Innovation*, Nesta, London, 2013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192022372/Microproduction-everywhere-Social-local-open-and-connected-manufacturing>).

且，毫无疑问，我提到的所有技术和社会文化创新不会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些可能会失去其社会价值，并被引导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过程中。但除此之外，分布式系统还有可能在本地分配权力和经济资源，从而促进福利和环境再生，进而使得整个区域保持健康。意思是说，如果它不被权力集团甚至实际的当地黑手党控制的话，但很不幸的是，这经常发生。为了避免无疑存在的这种危险，必须保证做出的选择和随后的活动是透明的、参与性的，并最终是民主的。

我们还应该说，原则上也可以将相同的透明度和民主治理政策应用于中央集权制度，以避免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政府权力被全球权力集团和黑手党接管。但是，这两种模型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对于集中式系统而言，透明度和民主管理本质上是困难的，但对于分布式系统而言，这是一种坚实的可能性。

最后，在将一定的权力配额返还给当地社区时，分布式系统的方案是唯一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民主危机的方案。是否以及如何将其实际付诸实践将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之一正是本书的中心主题，人们将如何行动，以及在人们身处其中的不断变化的背景中，人们能够将何种日常生活政策付诸实践。

数字民主的困难。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传播已经改变了民主进程发生的整个交流环境，但也为这一领域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挑战了塑造上个世纪民主国家的做法。10多年前，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此可能性称为新的“民主气氛”^[7]，将其描述为由地点、网络、平台和数字媒体组成的物理和虚拟混合空间，共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场所，可以在其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决定并使之付诸实践。但是，正如我们所知，事情并非如此。10年后，重要的芬兰研究中心SITRA写道：“在技术使我们理论上可以更深入地相互联系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正在目睹隔离、过滤气泡和均质化的巨大趋势^[8]。”

确实，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传播正在对传统形式的民主，尤其是对代议制民主制产生毁灭性影响，而代议制民主迄今为止一直是复杂社会的基本支柱。这个问题是众所周知的且经过充分辩论，数字技术和连接性允许构建去本地化、去同步化和去中介化的社会形式。简而言之，人们现在可以在没有调解人的情况下进行交互，而不受他们所

[7] Latour Bruno and Peter Weibel. *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2005), pp. 14–43.

[8] Elna Kiiski Kataja, SITRA Memorandum *From the trials of democracy towards the future participation*, March 21, 2017.

处的位置以及交互时间的影响。因此出现了传统政治组织和代议制民主的危机。此外，这种连接性还导致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去中介化与传统的直接民主之间的短路。结果是出现了永久性直接民主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实时地表达自己。

无论有或没有数字支持，就某些明确定义的问题而言，直接民主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并非所有讨论中的问题都适用于这种处理方式，这必然会使问题简化为只能用“是”或“否”回答的问题，从而简化了问题。经验表明，如果不进行不残酷的过度简化，很少有問題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毫不奇怪，在政治危机和对人们传统民主原则异常愤怒之际，有人提出了这种直接行使民主方式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以永久性全民公决为基础的提议是错误的。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与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应该做的事情相反，过度简化所讨论的问题使民主本身变得琐碎。

意见在哪里形成？过去，意见是在与大型组织（教堂、政党、工会、文化组织等）的互动中形成的，大型组织的任务是产生、收集和验证想法，将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太远的对话者联系起来。

这些组织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却发挥了精确的作

用，它们提供了宏大的叙述，充当了经验、知识和专长的存取库，而这些经验、知识和专长通常是受信赖的政治家和专家。最终，这些组织提供了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这些舞台上根据这些对话比较想法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另一方面，数字民主呼吁每个人说出他们的想法，但并没有提供培养这些思想、更深入地研究这些思想并与其他观点进行对比的机会。简而言之，它没有提供在一定时间内产生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主意见可能性，以此来面对复杂问题。因此，我们会被那些大声喊叫，更有能力将建议压缩到推文的有限字数中的人的想法所欺骗；极大地减少了思想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有限的清晰表达和深刻见解。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进行讨论的公共场所逐渐消失，被脱口秀（人们大喊大叫，却没有讨论）和封闭的数字社区（人们以同样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所取代。这样做的结果也能叫作民主，人们越来越多地基于无根据的思想的扩延来交换肤浅的、简化的意见，怪物将在此产生。

然而，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并不是全部。重复本书中关于其他问题的论述，在更仔细地研究当代形势时，我们发现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以数字民主为主题的实验路线。由英国自称为“全球创新基金会”的智囊机构NESTA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有数百种工

具和平台正在被使用，以促进人们对民主进程的承诺。但它也表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所有或大多数案例研究都面临着许多挑战，并且在该领域存在许多空白，这些空白需要在数字民主振兴并恢复公众对民主体制和程序的信任之前被填补或解决”^[9]。就我而言，我想补充一下，要实现这一点，有必要发挥强大的设计能力，通过创造性和政治性的努力，使得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潜力与社会创新实践进行融合。

通过对数字民主领域中正在进行的实验进行简短的论述，我的目的是瞥见该领域的动态变化。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意图。因此，与以前的方式一致，我将尝试采用与前几章相同的观点来讨论某些问题。正如我在第1章中介绍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那样，他沉浸在日常生活中，从他的角度来看，面向民主，从行动的观点出发，他可以直接行使参与性民主。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将专注于这种民主及其动力，专注于正在经历的危机以及正在打开的机会。

在我上面引用的Nesta报告的结论中，当列出要面对的

[9] Julie Simon, Theo Bass, Victoria Boelman and Geoff Mulgan, *Digital Democracy. The Tools Transforming Political Engagement* (London: Nesta, 2017), p. 87.

挑战时，它首先强调了“对参与的更细微的了解”。这是我现在想做的，不仅因为参与式民主本身很重要，还因为它有可能在总体上重生民主。

参与

参与式民主与社会创新。近年来，民主危机甚至没有放过参与式民主，但我认为，以代议制民主受危机的影响程度相比，参与式民主中的危机形式不同，破坏性也较小。最重要的是，它还保留着活力与更新的显著迹象。

为了讨论这一点，我们必须退后一步。上个世纪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的思想以及推动民主的实践，之后得到了巩固。公法学教授翁贝托·阿莱格雷蒂（Umberto Allegrètti）做了很多工作在意大利推广这个议题，对他而言，参与式民主采取了“社会与体制之间的互动……形式，其目的是逐案产生可归因于两者的统一结果”^[10]。

这需要组织对话空间，以便使有问题的各利益方进行讨论和交流。传统上，讨论的结果是决策，然后将决策传达给有权执行这些决策的其他参与者。造成这种民主的危机可以归纳如下：讨论和决策活动冗长、累人，官僚主义

[10] Umberto Allegrètti, ed., *Democrazia partecipativa, Esperienze e prospettive in Italia e in Europa*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

的程序压抑，往往没有采取与决定相一致的行动。显然，这使参与看起来像是令人灰心的时间和精力浪费。

我相信，今天我们可以开始设想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社会创新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方法。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与技术创新融合，社会创新可以释放资源并创造新的社会形式，从而可以想象可行的新参与形式。

考虑到这一点，要了解这些可能性，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我们通常的参与性民主的观念。这意味着从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行政程序转变多种参与形式，参与式生态系统^[11]。

其性质和工作方式可能因案例而异。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我将回到主角的角度，并提出与我在第3章中提出的同样简单、天真的问题，为什么他要参加？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在参与性行动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他为什么要做出承诺，对自己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传统的回答是，

[11] Giovanni Allegretti, report of the event *Democrazia e design*, La Triennale di Milano, June 20, 2017. See also: Spada P. and Allegretti, G. 2016. "Integrating Multiple Channels of Engagement in Democratic Innov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itizen Engagemen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Volume edited by Marco Adria and Yuping Mao (Heshey, PA, Usa: IGI Global 2016).

他应该出于公民责任感而这样做，因为在涉及整个社区时，参与决策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答复仍然有效，但我们应该在此补充一点，即积极公民的动机和能力，对近年来社会创新的细读可以发现这种动机和能力。

因此，我们将回到前面提到的情况。例如，任何决定共同居住的人都这样做，因为他认为共享居住服务是有益、可行和经济上有利的。此外，他无疑也认识到与邻居分享的价值以及总体上的关系质量。最后，他很可能以为自己所做的事对整个社区和整个城市都是积极的（因为它产生了社会共同体，并以关于改善生活的创新思想为主题提供了对话）。对于创建农夫市集的农民和当地市民，以及所有致力于互助（在共同福利的总体框架内）或组织邻里文化活动（例如，城市复兴的地方倡议）的居民而言，都可以这样说；对于创客和新手工艺者来说，情况亦是如此（当他们参与在本地分布的开放生产活动时）。

一种新的公民意识。所有这些都凸显了社会创新给我们的初步经验，这是一种新型的公民意识。秉持新的公民意识，人们不仅参加关于公共利益问题的讨论，而且将自己的讨论付诸实践并加以管理。他为自己、与他合作的人以及整个社会这样做。

作为示例提供的案例也教给我们另一课，在这种参与形式中，决策直接与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谈论做什么的问题，也是执行已经讨论过的事情的问题。换句话说，讨论的人还必须能够实际完成已经讨论的事情。因此，要从社会创新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为实现结果而进行协作的团队组成确定了可以想象和实现该结果的可能空间（第2章）。或者换句话说，建立了我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之后，我们必须创建一个能够实现目标的团队。它不仅必须愿意，而且在技术上必须有能力，并具有做决定的政治权力。

这种进行方法（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说都是设计活动）的优势是能够获得实际结果，但是，在给定的背景下，它也限制了这种参与形式可以开展的领域。

但是，此限制不是固定的。这取决于可以形成的联盟。联盟几乎完全由活跃的公民组成，就像迄今为止描述大多数案例中的联盟一样，主要推动地方层面的行动倡议。另一方面，联盟也可能包括其他参与者，因此也包括其他能力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希望开发更广泛的项目，从而扩大参与模式可以发生的领域。

社会创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能证明在城市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有许多例子说明，前所未有的联盟（包括地

方政府和活跃公民以及协会、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大学和研究中心）自下而上发起倡议一起工作，从而引发了城市规模的项目。这样，有些城市从行人和骑车者的角度出发，重新设计了他们的出行系统。其他人从城市和郊区农业开始重新考虑食品安全；还有一些人引入城市再工业化的概念，为小型工业、传统工匠和新数字手工艺人的网络腾出空间。有些镇议会已经将各种项目进行了整合，例如将其描述为其计划的基本组成部分，并将其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灵活的城市更新计划^[12]。

这些协作城市（以市民之间、他们的协会与当地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为特征），可以看作一个扩展的赋能系统，能够促进和支持各种规模的倡议。因此，它们为公民提供了可供讨论和采取行动的许多问题和领域。这意味着协作城市中的赋能系统也成为参与性系统。我们可以以米兰为例。

[12] 欧洲研究计划 URBACT 先进案例中提供了 97 个以这种方式进行工作的城市。See Peter Ramsden, *Experimenting with governance*, 12 December 2017 (<http://urbact.eu/experimenting-governance>. <http://urbact.eu/experimenting-governance>); Francois Jegou, Marcelline Bonneau, *Social Innovation In cities*, Urbact II, April 2015, Published by Urbact, Sant Denis (France) 2015 (http://urbact.eu/sites/default/files/03_socialinn-web.pdf).

参与式赋能生态系统。几年前，米兰市议会开始了“聆听城市”计划（意思是听取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所有社会角色，包括公民及其组织），并仔细规划了那里正在进行的所有社会创新行动^[13]。从这里出现了各种战略目标，均指向以增强城市中现有社会和文化资源为基础的城市更新。为此，市议会投资于有形和无形的基础设施，支持网络、培训以及技能和能力提升，最后是重建适合这些活动的城市空间。此外，它还努力营造“一种信任与合作的氛围，能够促进信息和复杂知识的交流，共同行为规则的定义，联合行动的发展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更多参与”^[14]。简而言之，它努力产生必要的社会公地，使所有其他一切成为可能。

[13] 这些战略目标的定义过程始于2013年4月，当时组织了一个名为“公共听证会：迈向米兰智慧城市”的公开倡议。这项举措标志着与以往做法的不连续，因为从一开始，它就试图让所有角色参与进来，并为他们留下活跃的主角空间。Libro Bianco di Milano sull'innovazione sociale, Milano, Aprile 2017 (http://www.milanosmartcity.org/joomla/images/libro%20bianco_innovazione%20sociale.pdf).

[14] 翻译自 Libro Bianco di Milano sull'innovazione sociale（米兰社会创新白皮书），Milano, Aprile 2017, p. 21 (http://www.milanosmartcity.org/joomla/images/libro%20bianco_innovazione%20sociale.pdf).

结果是为大量社会、文化、体育和小型商业项目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其中包括社区福利、协作式生活和工作、数字工艺，以及创建企业孵化器以推广协作经济模式。这极大地有助于重新定义整个城市，使其更具活力。

“公民城市”（città dei cittadini）由此出现，这不仅是为公民打造的城市（被视为城市使用者），而且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城市，由居民建造的城市（可能不是在其物理维度，而是在其服务和组织的关系方面）。的确，如果没有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广泛联盟，那么我现在描述的结果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没有直接相关者的积极合作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因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像这样的城市更新政策的特点在于，它们不能仅自上而下地执行。除非时机成熟，如果直接相关的人们没有动力和能力采取行动，那么必然什么也做不了。因此，由于始终需要公民的直接行动，因此有必要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主动的（即使这是公共实体的“善意协调”）。公共实体必须为他们留有必要的决策和运营空间，这最终意味着，直接相关的人必须有权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补充说，如果没有适当的治理，像这些案例中所描述的那样，自下而上的行动倡议就不会

诞生和传播，也就不会有能力建立城市规模的赋能生态系统并承认其为参与式生态系统。公共机构以这种方式行动并不容易。确实，这不仅是让公民参与讨论的问题，还在于它需要赋予他们以部分权力来制定和实施决策。反过来，这要求在治理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并做出大量的政治承诺^[15]。

因此，米兰的例子使我们明确了我们的期望，通过促进和支持社会创新，协作式城市的赋能系统为讨论做什么和如何做提供了话题和领域。因此，它们引导活跃的公民共同设计项目，并在运动中设定一种新的参与式民主形式。我们将其称为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

使事情发生

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让我们想象一下社会是一个交织在一起的人际网络，目的是讨论和决定要做什么和做（或试图做）已经决定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况的环境或多或少是有利的，这意味着可能或多或少地着眼于共同利益进行对话，它们将成为决策，然后是协作行动。可以想象

[15] E. Manzini, E. Staszowski, *Public and Collaborative* (DESIS Network, Milan, 2013) (http://www.desis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DESIS_PUBLIcolab-Book.pdf).

的这些行动的最佳方式发生的所处的环境是民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这意味着一个参与式的赋能生态系统，每个人都可以开发自己的项目并取得成果，同时不减少其他人行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能独自设计和生产协作式项目，这意味着民主也源于协作并产生协作。其结果是促进社会公地的复兴。

这一切与60年前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产生了共鸣。对她而言，民主应被描述为关于共同利益的复杂对话^[16]。她还说，这些对话可能会出现在公共场所并变成具体的行动。当人们合作时，从对话到行动的转变是可能的；最后，这种合作是在共同利益可见和可代表时才能发生。对阿伦特而言，利益绝不是个人的，它总是一种存在，存在于不同人类之间，必须加以定义并在社会性质上得到认可^[17]。因此，我还要补充，追求这种利益总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而正是这种协作让人们能够使事情发生。阿伦特写道，这是别人无法提

[16]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17] Virginia Tassinari, contribution posted on DESIS Philosophy Talk, *Regenerating Democracy. A design contribution*, Transit Conference, Rotterdam 14, 2017.

供的力量，而是源于他们认识共同利益并通过协作将其转化为成果的能力。有了这些想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的那一刻，阿伦特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背景知识和语言，至少在原则上，她的想象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想象一个人民的社会，这些人有能力专注于共同利益并将其转化为对世界的行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是一种环境，倾向于给每个人提供聚会和合作的可能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追求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目标。在这个定义中，这两个层面（个人和集体）的共存是特征。如果环境只是为单个项目提供有利的条件，那么它似乎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大的自由，但这只会在人们所使用的系统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范围内发生。另一方面，如我们所见，为合作项目提供有利条件的环境为拥有或可以承担执行决策权力的联盟提供了空间。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可以创造条件来完成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制度也是一种有利于创建分布式系统的环境，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在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决定。

鉴于这些特征，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是参与性民主的一种形式，它支持、整合并有可能合作以再生其他形式的

民主。它为那些为自己和所属社区创造价值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新公民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更好地理解所有这一切如何发生，换句话说，这些不同形式的民主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形成。

我们将从以下相当明显的考虑开始，基于项目的民主所促成的项目是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的公民群体行动的结果。他们是积极的公民，他们找到参与所需的时间、注意力和精力。另一方面，仅仅因为他们如此活跃，这些人往往不代表多数。

确实，很多时候，一小批积极的公民促进了社会创新的最有趣和最动人的经历，而这些公民一开始并不为他人所理解。有时，它们甚至与当时和那个地方普遍存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这些经验，或者至少是较为成功的经验，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如果由少数公民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想法是好的，它们就会逐渐传播，变得更加一致，并最终进行民主讨论，获得批准。社区花园、城市菜园和有机食品项目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的明显例子。开始时，这些活动仅由少量的积极分子团体提出并进行（有时甚至是非法的）。然后，据我们所知，它们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正如我们在协作式城市中所看到的那

样，它们已得到公共行政部门的认可和规范化，这意味着它们也已得到代议制民主各个部门的正式批准。

随之而来的是，在我们正在谈论的参与式的赋能生态系统中，在非正式地产生新思想的积极公民群体与有权批准和使之制度化的代议民主制有机体之间可能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因此，它们得到了民主的批准和监管，成为更有利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基础设施。我们如何创造条件使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更加可能存在？我们如何才能将积极公民的集体行动与代议制民主的实践结合在一起，以便彼此支持？为了讨论这一点，我们将返回已经提到的SITRA报告。它在结论中说，有效的民主需要可以参与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社会基础设施与传统的道路和桥梁基础设施一样必要……公共权力在创建这种社会基础设施中的可能作用是世界政治的普遍问题^[18]。如何为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建立这种基础设施？成熟的社会创新经验，尤其是协作城市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我们在给出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基础结构实际上与其赋能生态系统相对应。赋能生态系统和参与性生态

[18] Elina Kiiski Kataja, *SITRA Memorandum From the trials of democracy towards the future participation*, March 21, 2017.

系统的等价性是普遍性规律，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在其充当民主基础设施作用的同时反思该生态系统的性质和特征^[19]。

基础设施的特点是能够支持各种项目。要发挥这一作用，它必须包括各种要素。首先，它必须包括民主博弈的规则（确保每个项目都尊重其他项目的存在，并具有同等的成功可能性）、物理和虚拟的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开会并决定目标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在线服务和离线支持（使共同设计和共同创造活动更容易获得和有效）以及社会公地（例如信任和共享价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是所有形态合作的前提）。

除了这些要素之外，基础设施还具有支持项目活动的方式。实际上，这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总是有一定的

[19] Star SL, Bowker X (2002) How to infrastructure, in: Lievrouw LA, Livingstone SL (eds), *The handbook of new media*, SAGE, London, pp. 151–162; Bjorgvinsson E, Ehn P, Hillgren PA (2010)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democratizing innovation*. In proceedings of participatory design conference, 2010, pp. 43–49. Carl Di Salvo, Design, Democracy and Agonistic Pluralism,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ttp://www.democracy-design.org/wp-content/uploads/2017/05/Design-Democracy-and-Agonistic-Pluralism.pdf>).

导向。我们可以将这种特性称为“可见性”^[20]，一种人工物邀请某种使用方式的能力。这种方式不强迫任何特定行为，但是使某种行为比其他的更有可能。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所谈论的可见性是基础设施支持项目的能力，这意味着它邀请设计联盟考虑嵌入在特定基础设施内部的知识 and 价值观（也是最初构思和创建它的社区认为重要的知识和价值观）。

例如，地方行政当局可以向正在设计项目的公民提供区域或城市空间，指出要项目发起者接受一些一般性原则，并承诺自己（即地方行政当局本身）支持该项目。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在意大利被称为“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协作规定”（Regolamento di collaborazione tra cittadini e

[20] “可见性”这一术语最初是与物理对象有关的，是指它们的实际形状和形式能够向用户建议如何使用它们的方法，从门的打开方式到从茶壶倒水的方式。实际上，即使用户以前从未见过该物品并且没有说明，这也可能同样有效。此术语此后已扩展到物理和虚拟环境，表示它们的形态邀请人们去做。James Jerome Gibson.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1979); Donald A. Norman. *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gs*.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8).

Amministrazione^[21])，这就是参与式赋能系统以及民主基础设施的明显例子。这种基础设施的承受能力也同样明确，通过表明各方参与的方式并给出一般原则，可以激发和支持公民的创造力和事业，使他们面向城市公地生产。换句话说，积极公民的价值和公地的价值被纳入基础设施及其工作方式。

在我看来，民主基础设施中的可见性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这也是很微妙的，因为它很容易被误解，我们如何调和基础设施所引导的方向和民主作为培养自治及多元意见的制度之间的冲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牢记，正如我之前所写，民主也是一种有学习能力的政权。这意味着它能够积累经过深思熟虑的经验，过滤出最佳经验并将它们以共享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形式嵌入自

[21] 在这些法规中，地方政府应制定清单，由公民、协会、社会企业和私营企业组成的联盟可以在该领域中提出有关如何做和如何做的想法。Gregorio Arena, Christian Iaione, *L'età della condivisione. La collaborazione tra cittadini e amministrazione per i beni comuni* (Carrocci Editore: Roma, 2015) For the Bologna example, see: "Regolamento di collaborazione tra cittadini e amministrazione per la cura e la rigenerazione dei beni comuni urbani" (<http://www.comune.bologna.i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i/REGOLAMENTO%20BENI%20COMUNI.pdf>).

身。这意味着培养多样性与在各个层面上保持中立的想法并不吻合。例如，我们今天提到的民主思想对人权不是中立的，它的基础设施应包括能够引导我们不去违背人权的能力。在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制度下，对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某些基本主题，情况也应如此。例如，合作，人们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之间的关系交织，公地的复兴。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可见性的作用是将基础设施的运营水平（赋能项目）与文化水平（引导项目）联系起来。

分散的设计能力。但是，拥有适当的基础设施不足以使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成为可能，这还需要在足够多的人中分散设计能力。因此，为了增加潜力，还必须增加积极公民的数量，并提高他们每个人的设计能力。这需要适当的干预。尽管设计能力是所有人都有的潜在能力，但要实现这种潜能，就必须加以培养（就像其他任何人类能力一样，参见第2章）。

到目前为止，在参与式设计和协同设计领域的长期经验可以通过为设计项目提供大量支持工具来提供帮助。这些不仅可以实现共同的结果，还具有有益的附带作用，即提高每个相关人员的设计能力。应将这些工具带给更广泛的公众，使它们更易于获得和使用，并有望成为公民常规

基本文化的一部分^[22]。此外，每项设计活动不仅是工具的问题，而且是思想、价值、知识、批判性意识和创造力的问题，因此也有必要沿着这些思路发展一些基本能力。换句话说，人们还需要文化工具，使他们能够认识到当前的问题和机会，并想象可能的未来（常规未来除外）^[23]。因此，除了共同设计的操作工具之外，至关重要

[22] 这个主题由 Daniela Selloni 在她的书 *CoDesign for Public-Interest Services*（《面向公众利益的协同设计》）中开发。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设计能力的传播，或更确切地说，参与协同设计过程的能力，本身应该被视为一项公共利益服务。Daniela Selloni, *CoDesign for Public-Interests Service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See also: Thomas Binder, Eva Brandt, Pelle Ehn & Joachim Halse (2015) Democratic design experiments: between parliament and laboratory, *CoDesign*, 11:3-4, 152-165, DOI: 10.1080/15710882.2015.1081248.

[23] 有一种思路称得上不无道理，参与工具，尤其是参与式设计工具也可以成为建立对主导利益的共识的工具。这当然是成立的，但我相信这种情况的风险并不在于协同设计本身，而在于随之而来的诠释，导致我们专注于工具而忘记了内容。

Karl Palma and Otto von Busch, Quasi-Quisling: co-design and the Assembly of Collaborateurs, *CoDesign*, 2015, Vol. 11, No. 3-4, pp. 236-249; Otto von Busch and Karl Palms, *Social means do not justify corruptible ends: A realist perspective on social innovation and design* (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June 2017).

关人群中适当地传播设计文化。

“设计文化”一词在这里是指价值观和知识的混合体，这些价值观和知识源于对以往经验的反思积累，这些经验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滋养社会对话并产生新的想法和共同愿景^[24]。在本书中，我试图展示其各种要素，从复杂性的价值到轻盈的新社区建设；从赋予个人以生活计划的对话意识，到对它们可能的政治含义的认识；从社会行动主义的价值到变革常态的价值。所有这些主题都引出了相同的设计问题，协作以及重新连接人和地方的能力，从而产生关系价值和社会公地。

如前所述，其中一些主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迹象可以被纳入可见的民主基础设施。其他主题则可以成为各种社会角色的个人选择，以指引他们的行动。总而言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它们可以成为项目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可以滋养一个社会的民主生活，提高讨论的水平。

的确，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

[24] Manzini, E., Tassinari, V, (2013), Sustainable qualities: powerful drivers of social change, in Crocker. R. Lehmann, S. (edited by), *Motivating Change* (Earthscan, London); Ezio Manzini, Design culture, Dialogic design, in *Design Issues*, Volume 32, No.1 (Winter 2016).

民主一样，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各种声音相互抵消。取而代之的是，这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一个伟大的实验室，在该实验室中进行了多声道实验，探讨了如何朝着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发展。我试图补充的想法是，参与者的设计能力培养得越多，这种集体反思就会越有成效。因此，适应世界复杂性的设计文化将进一步丰富这种能力，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25]。

[25] 关于设计文化如何协作以再生民主的讨论必须找到新的发展领域。其中之一可能是DDP民主设计平台（Democracy Design Platform）。这是由DESIS网络和米兰理工大学设计政策实验室创建的数字平台。DDP打算收集与参与式民主有关的倡议，尤其是本书中以项目为中心的民主所涉及的倡议。DDP成立于2017年，前身是维克多·马格林（Victor Margolin）和我本人发出的公开信“捍卫民主”，以鼓励读者反对日益增长的对民主的攻击，并倡导民主再生活动（<http://www.democracy-design.org/open-letter-stand-up-democracy>）。

后记：另一本书/设计专家和分散的设计能力

1. 在本书中，做出设计选择的人们，无论是否意识到这样做，都被视为设计师。因此，当我们今天置身于动荡不定的世界中，这意味着潜在的所有人都是设计师。该书提出了一种方案，在这些方案的支持下，这些日常生活设计师可以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为此，必须形成能够实验新途径并从经验中学习的设计联盟。这些联盟中的每个人都是设计师，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相同的设计师。他们内部有不同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特长和能力。有些人直接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生活，所以非常了解，还有一些人在特定方面带来了知识和经验。其中还包括设计专家；意味着传统上被称为设计师的人，受过训练以专注、发展和使用设计文化和工具的人。

在本书中，我几乎没有提到他们及其作用。一本书无法讨论所有内容。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集中讨论分散设计能力及其可能性的问题，但是现在，在我讨论了分散的设计功能的四章之后，对专家设计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概

括是很有用的。

2. 在新的设计联盟中，设计专家的作用是什么？他们的贡献到底是什么？许多作者，包括我自己，都回答了看起来相似的问题：专家在协同设计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在促进和支持社会创新中扮演什么角色？尽管他们与本书中提出的问题相吻合，但实际上并不一致。

要讨论设计专家在设计联盟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回到讨论共同设计和社会创新设计。但是，这必须扩展到新领域，要探索新领域，还需要回答其他问题：设计专家在既有利又具参与性的赋能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他们如何在变革性现实中运作，平衡可获得性和关系价值的产生？他们如何激发和支持偏离主流思想进行自主行动的分散设计文化？然后，更笼统地说设计专家在既有利又具参与性的赋能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什么，这种集体设计智能是否可以培养多样性和批判意识，以催化必要的积极资源，将我们带出当前所陷入的环境、社会和文化灾难？

所有这些都是紧迫的问题，但是还需要另一本书来回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常的政治: 韧性社会的生活项目 / (意) 埃左·曼奇尼著; 钟芳译. -- 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5580-7582-7

I. ①日… II. ①埃… ②钟… III. ①设计-研究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176996号

Ezio Manzini, 2019

This translation of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 is published by Jiangsu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Lt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10-2019-144

责任编辑 韩 冰

装帧设计 高 森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张宇华

书 名 日常的政治: 韧性社会的生活项目

著 者 [意] 埃佐·曼奇尼

译 者 钟 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mscbs.com.cn>

制 版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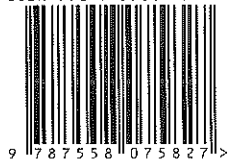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80-7582-7

定 价 52.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792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ISBN 978-7-5580-7582-7



9 787558 075827 >